

2013No3

滿鐵研究

Man Zie Yan Jiu



中國近現代史史料學學會滿鐵資料研究分會

目錄

Contents

01 卷首语 厘清满铁背后的历史脉络

持稿

02 苏崇民 关于满铁研究的思考

論壇

07 吴利薇 日本对中国基督教研究文献

19 许 勇 汤尔和与《满铁外交论》

史証

22 周爱民 关于小村寿太郎功德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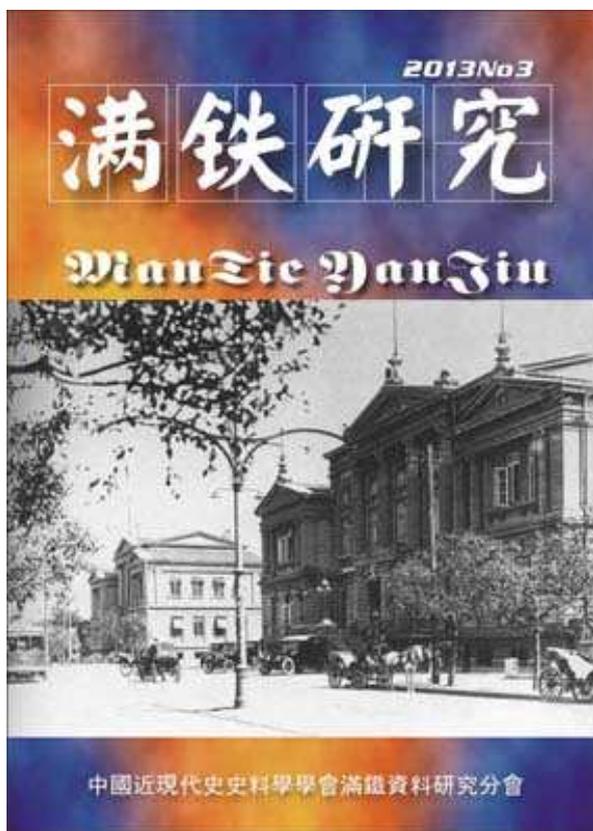
27 孟月明 九一八后日本对中国的移民侵略

文摘

35 佚名 中东铁路建设与回归始末

41 郑春妍 《满铁资料研究分会信息通报》

<http://blog.sina.com.cn/mantieyanjiu>



滿鐵研究

MAN TIE YAN JIU

《满铁研究》编委会

主任: 关忠良 魏海生

顾问: 国 林 葛剑雄 张本义

沈友益 李海绩 李东翔

编委: 关忠良 魏海生 韩宝明

郑 兰 刘建设 许 勇

主管: 满铁资料研究分会

主办: 北京交通大学图书馆

主编: 韩宝明

编辑: 《满铁研究》编辑部

邮箱: mantieyanjiu@163.com

地址: 北京交大图书馆 611 室

邮编: 100044

期次: 2013 No3 (总第 19 期)

日期: 2013 年 9 月 28 日

网址: lib.njtu.edu.cn/mt/mtyj.html

版權聲明

《满铁研究》刊载之文字和图片, 其版权归作者所有。凡转载、摘编本刊内容, 请注明“转载自《满铁研究》”, 并按规定向作者支付稿酬。否则本刊将追究违反规定者的法律责任。

徵文啓事

《满铁研究》是一份由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满铁资料研究分会主管, 北京交通大学图书馆主办的史学季刊。传递信息、交流学术, 揭示历史, 畅想未来是《满铁研究》的办刊理念和既定目标。本刊设简讯、动态、特稿、书评、史证、文摘、论坛、图库、译林、杂俎等栏目。欢迎海内外满铁研究领域的专家和爱好者为本刊赐稿。

執行主編: 許勇

卷首語

厘清滿鐵背后的歷史脈絡

与满铁相关的史料整理及史学研究，在内地业已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相对于海外尤其是日本的满铁研究而言，除了《满铁史》、《隔世遗思》两部专著和一套联合目录外，拿得出手的学术成果实在不多。究其原因，恐怕是我们的视野茫然所致，犹如大海行船少了灯塔，没了罗盘，最终只能落个或偏离航道，或随波逐流的结局。

本期特稿「关于满铁研究的思考——检点围绕满铁的各种关系」非常难得及重要，作者苏崇民教授思考并罗列的围绕满铁的九大关系，不仅厘清了满铁背后的历史脉络，更为今后高水平的满铁研究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日本对中国基督教研究文献——以辽宁省图书馆藏 1945 年前出版日文文献为研究中心」为吴利薇、洪晓梅两位教授联袂所撰，该文就辽图所藏的日文版基督教文献，配合多枚相关图书藏章图片，做了较为全面的介绍。从这批日文藏书，也可管窥满铁这头侵略怪兽当年出版与调查事业的“盛况”。

看过《满铁外交论》的人不会很多，了解译者的就更少了。汤尔和，“海归”医学博士，当过校长，也做过总长。一个与铁路不沾边的医生兼官僚，居然编译了好几本与满铁有关的书，这是为什么呢，不妨先看看再说。

「关于小村寿太郎功德碑」一文是旅顺日俄监狱旧址博物馆的周爱民写的，这块碑现存他供职的单位。小村寿太郎曾任驻华公使，后官至日本外相，他积极主张侵略中国，是“日清开战论”的倡导者。而为这位人送外号“鼠公使”立碑树传的，正是与其同为一丘之貉的时任满铁总裁松冈洋右。

9 月 18 日，是每一个中国人都不应忘却的日子。倭寇扰华自古便有，到了近代更是得寸进尺，情报刺探、经济渗透、外交干涉、军事占领，日本侵华不仅手段齷齪，而且花样繁多，向东北移民便是其损招之一。欲知真相，请看「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移民侵略」。

「中东铁路建设与回归始末」看似与满铁关系不大，实际不然。苏崇民教授归纳的满铁研究九大课题中，第五个便是满铁与中东铁路的关系。苏老认为：“南满中东的联络和竞争对东北经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这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中东铁路是俄国侵华的产物，亦为其西伯利亚铁路的联络线。中东铁路 1898 年开工，1903 年建成。中东铁路管理局不仅在哈尔滨建有办公大楼，还先后设立了隶属该局的工厂、医院、学校以及所谓的“附属地”。

可以说，在靠修建和经营铁路侵略中国方面，沙皇俄国的贪婪与急迫丝毫不比天皇日本来的逊色。



關於滿鐵研究的思考

——檢點圍繞滿鐵的各種關係

苏崇民*

满铁从设立到灭亡(1906-1945)历经 40 年,这一历史时期,在东亚发生的重大事件,如东三省五案交涉、美国的东北铁路中立化计划、日俄划分南北满势力范围、干涉辛亥革命、奉系军阀的形成、日本出兵山东占领胶济路、二十一条交涉、五四运动、日美共管中东路、奉直战争、满蒙五路交涉、东北铁路网计划、九一八事变、收购中东路、伪满五年计划和北边振兴计划、七七事变、占领华北铁路工厂矿山、关特演、陆运转嫁、关东军构筑通化防御体系直至战败投降,处处都有满铁的影子。

关于满铁的研究,任重而道远。切盼在下列各方面能有进一步的突破。

第一个是满铁同日本政界的关系。

满铁是一个国策公司,所以对满铁来说,首要的就是它与日本政府的关系,包括日本总理大臣、外务省、大藏省、拓殖省、铁道省、递信省、对满事务局、企划院、兴亚院以及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及领事馆的关系,还有它与日本国会即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关系。

满铁本是日本政府一手炮制的,虽然形式上是股份公司,有民间股份即商股的存在,但它不是通常的官商合办企业,它是日本政府根据日俄媾和条约和中日东三省善后条约所攫取的战利品——铁路、煤矿和港口以及帝国主义特权为基础设立的,日本政府将经略中国东北的侵略扩张任务赋予满铁,日本政府始终掌握满铁的过半数股份。日本天皇的敕令是超乎满铁章程之上的满铁根本大法。满铁的总裁(社长)、副总裁(副社长)和理事们是政府任命的,它的股东红利和公司债利息是由政府保证的,它所经营的事业范围是政府指定的。

日本政府的对华方针政策制约着满铁的经营方针,日本政府的动向总是在满铁有所反映,政府的更替往往引起满铁总裁的易人。

日本政府设有监督满铁的官厅系统,在中央机关经常是属于总理大臣或拓殖大臣,属于外事方面的由外务大臣,属于财务方面的由大藏大臣,“九一八事变”后又设置对满事务局。在地方则由关东都督(关东厅长官、驻满洲国全权大使)行使直接监督。

其中,最值得研究的是满铁与大藏省的关系。日本政府的官股是放在大藏大臣的名下,满铁的增资、缴纳以及资本的投放首先要经大藏大臣的认可。满铁公司债特别是外债的发行更要有大藏省的许可和协助。满铁上缴国库的红利是大藏省一项重要财源。满铁的理事中总是有大藏省出身的人占有重要席位,满铁与大藏省的关系及其如何运作值得深入研究。

当然,满铁的监督官厅,对满铁是怎样行使监督权的,满铁对这些监督采取什么对策,在什么情况下这种监督生效和起了什么作用?需要具体的深入的研究。

除政府之外,政界还包括政党,特别是日本政党内阁时期,政党对满铁的影响极大。研究满铁和政党的关系也是深入研究满铁所必需的。

* 苏崇民,吉林大学日本研究所教授。

第二个是满铁与日本军界的关系。

日本是军国主义国家，日本军部是超然于日本政府之外的存在。满铁与日本军部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关系。满铁本来就是战争的副产品，从设立时起就与日本军部密不可分，前后两任满铁设立委员长都由军部的头目担任，铁路、港口和煤矿也是先由日军从俄国方面夺得或接收，然后移交给满铁的。可以说日军的野战铁道提理部就是满铁的胚胎。

日本军方，这里首先是指日本陆军。参谋本部、陆军省、关东都督府、关东军司令部、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日本驻华总司令部、陆军特务机关、第九一八部队和七三一部队等等。其中，特别是参谋本部和关东军司令部。

日本海军则有军令部、海军省、海军燃料厂和海军特务机关等。

平时，每当新任满铁总裁上任，日军参谋本部都要向满铁总裁提出各种军事上的要求，对满铁的铁路和港口设施、桥梁、涵洞、车辆甚至联结器的修建标准都有特殊要求。军方专设联络官同满铁协调军运事项。甚至日军在中国东北的高级间谍也曾经放在满铁，以公所长和调查委员长的身份应酬于中国官场之中。

满铁同关东军的关系尤为密切，从 1906 年满铁设立直到九一八事变前，满铁是日本经营“满洲”的主角，关东军的主要任务就是为满铁保驾护航，一般来说，满铁总裁是大臣级别的人物，而关东军司令官只是陆军中将。（唯一的例外，是在一战的寺内军阀内阁时期，将满铁总裁中村雄次郎转为现役军人并任命为关东都督，使之统裁满铁事务，一度将满铁置于军人的指挥之下）。

满铁与关东军在干涉辛亥革命、策划满蒙独立运动、干涉十月革命、破坏中国民众的护路斗争、反对东北易帜，直至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全东北，都是互相配合狼狈为奸的。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一跃成为日本在东北的最高当局，不仅在所谓委托经营的“国宥”铁路、水路和公路运输方面对满铁行使监督权，而且，对满铁的固有业务即所谓“社线”部分，也以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大使的身份，取得了实质上的监督权。满铁遂逐步沦为关东军控制东北侵略华北和准备对苏战争的得力助手。满铁与关东军的关系是满铁研究方面一个经久的课题。

满铁与日本海军也有密切关系，除在旅顺开港问题上互有争执外，在特殊钢的研制、海军用牛肉的供应、原油的生产炼制，以至对南方的调查等方面都有密切合作。

第三个是满铁与日本财界的关系

日本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不足却相对集中。经过对华对俄的两场帝国主义战争，财阀资本已经在金融方面占据统治地位。特别是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四大全国性财阀，在金融界已处于垄断地位。地方也有中小财阀，在东北则有大仓和相生财阀。后来日本又出现日产一类靠战争起家的新兴财阀。

满铁设立当时由于有意分散了民间股东的股权，使财阀资本在满铁的股本中无足轻重。但是随满铁的增资和股票的上市，财阀通过不断地收购，相继成为满铁的民间大股东，由他们的代表出任满铁监事并组成监事会，对满铁的经营方针施加影响。

一战之后，满铁的公司债转向日本国内发行，财阀就成为满铁公司债的主要认购者，他们也是发放满铁短期贷款的银行的后台老板。通过金融市场他们对满铁的经营也取得一定的发言权。1934 年关东军改组满铁计划的流产就和日本财阀抵制满铁公司债有直接关系。

日本财阀还是满铁的大供货商，满铁所需的大量机车、车辆、铁轨和机器设

备，几乎都是三井、三菱系统的公司代为采购的。满铁生产的煤、铁也要靠他们销售和出口。据此，他们从满铁分得数量不菲的超额利润。他们还是满铁承运的货物——大豆、棉布、建材等的大货主，在运费上享受特殊优惠。对于财阀系统在东北的企业，满铁也从各个方面给予补贴。“九一八事变”后，满铁又在关东军的授意下联合财阀投资许多军需生产的“特殊会社”。在这方面，满铁起了领头羊的作用。

在人事上，财阀也在满铁安插代理人，三井、三菱都有重量级人物充当满铁的总裁或副总裁，相当数量的满铁理事就来自财阀系统，总之，满铁同日本财阀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过，他们之间有合作也有竞争，情况复杂，不能一概而论。满铁与财阀的关系，特别是满铁与三井和三菱的关系是深入研究满铁的不可或缺的课题。

除财阀外，满铁同日本的特殊银行如横滨正金银行、兴业银行、朝鲜银行等也有分工和合作。满铁的业务中不包括银行业。正金银行和兴业银行则作为满铁的两翼而存在。日本银行团包括大的保险公司还组成满铁借款团，购买满铁的公司债。

第四个是满铁与中国政界的关系

满铁在中国大地上运营不能避开中国政府的管理，因此，讨好中国政府官员，尤其是东北的地方大吏和铁路系统的掌权人物就成为满铁的一项职能。满铁历届总裁（社长）都要拉拢东北的地方官和铁路官员，确实有部分官员被满铁收买为其利用。东北军阀张作霖、吴俊升为了打内战就拿过满铁的巨额贷款。交通系的官僚也有不少上了满铁的贼船。

但是，满铁作为侵略机构，它的侵略活动与中国的主权和利益从根本上是不相容的，因此，满铁与中国政府特别是东北当局是纠纷不断，悬案累累，满铁附属地扩张问题、土地商租权问题、林场问题、农场问题、矿务纠纷问题、防谷令问题、利权回收问题、铁路联运问题和葫芦岛筑港问题等等，层出不穷，有时达到剑拔弩张的地步。满铁的铁路网计划和东北当局的铁路网计划针锋相对，东北交通委员会更成为满铁的眼中钉肉中刺。

其中比较突出的当属满铁与中国自办铁路的关系。

在东北，满铁设立当时除南满铁路外只有北面的中东路和西面的京奉路，满铁企图发展南满铁路的培养线，完全垄断东北的铁路交通。于是有了吉长路、四洮路和吉敦路。同时，它又以反对修筑南满铁路“平行线”为借口，一再破坏中国自筑铁路。但是，中国自办的沈海路、吉海路、打通路、还有以中资为主的洮昂路等相继竣工。以北宁（京奉）路为主导的东四路联运和西四路联运初步形成，满铁一家独大的垄断地位摇摇欲坠，形势急转直下。满铁乃大肆张扬中国铁路包围南满铁路，威胁日本的生命线。满铁一面破坏中国铁路的联络，一面发动激烈的减价竞争。甚至以动用武力干涉进行恫吓。

在中国的土地上，不许中国自己筑路，破坏中国铁路的连接，扣留铁路车辆，突显了南满铁路作为日本殖民侵略工具的本质。

第五个是满铁与中东路的关系

南满铁路原本是俄国主管的中东路南满支线的一部分，满铁设立后，形成以长春为界南满路在南中东路在北的对峙局面。中东路东行有海参崴作为出海口，无需依赖大连。南满路虽然有大连作为出海口，如果不同中东路联络，就只能止于作为地方铁路，局限性极大，若想成为国际性大铁路的一部分，唯有同中东路联络，别无他途。此外，将面积更广阔，物产更丰富的东北北部的货源，吸取到

南满路，也必须实现同中东路的联络。总之，同中东路联络，是南满铁路运营上所必需，同中东路局合作是满铁的宿命。

但是，北部的物产是东行经海参崴出海，还是南行经大连出海，却是关系到中东路和南满路二者消长存亡的重大问题。中东路的南部线路程较短，它的收入对中东路无足轻重，为使货物东行，便对南行货物课以高额运费，以阻止货物南下。满铁为吸引货物南下，对中东路展开激烈的竞争，采取了降低运费、动员马拉大车以及设置吸货机构等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随局势的变化，双方时而妥协时而绝裂，斗争从未停息。两路的减价竞争使处于垄断地位的两条铁路不能维持垄断高额运费，客观上促进了东北经济特别是东北农业的发展。

南满中东的联络和竞争对东北经济的影响极是多方面的，这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

第六个是满铁同国际金融资本的关系

美国金融资本协助日本打败了俄国，在日俄签订转让南满铁路的议和条约之后，美国铁路大王哈利曼就与日本首相桂太郎签订了买卖南满铁路的桂哈草约，如果此事成真，美国资本将君临东北。不过，日本随即废弃了这个草约，打破了哈利曼环球铁路的美梦，日美的蜜月时期遂告结束。

满铁创业伊始，严重短缺资金，日本政府决定依靠外债，由于美国金融市场不理想，主要是在英国举债，渡过创业难关。

其后，哈利曼虽一再努力恢复草约，终未如愿。美国又陆续抛出锦璜铁路计划和满洲铁路中立化计划，均被日本联合俄国所抵制。尽管满铁后来向美国订购了大批机车车辆机器设备，但日美在东北的争夺，一刻也没停息过。美国一再打出机会均等的大棒敲打满铁。

满铁也曾策划吸收美国资本合办鞍山钢铁厂，又曾在美国交涉借款以便完成其满洲铁道网计划，那就是轰动一时的拉蒙特借款交涉，这项借款交涉遭到中国各方的反对，其中包括张作霖的强烈反对，终于引来美国政府的干涉，使这一交涉功败垂成。满铁在日美对东北的争夺之中，绝对是日本手中的一张王牌。“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也曾有过吸收美国资本的念头，不过那已经不是满铁的问题了。

“九一八事变”后，英国和法国的金融资本分别主动找上满铁，想要通过与满铁合作分享巨大的殖民地利益，

只是由于满铁采取消极态度以及英法资本的后劲不足，再加上欧洲政局的动荡，终于不了了之。

满铁与拉蒙特的借款交涉突显满铁对美国金融资本的期望，这一借款虽未成功，但在当时国际环境中，它涉及中日美政界、军界和财界的各种关系，影响深远。由于有关资料不是日文就是英文，因此这将是一项艰难而很有意义的研究。

第七个是满铁与中国民众的关系

首先是满铁与中国民族资本的关系

满铁作为入侵的外国垄断资本与中国民族资本在本质上是对立的，铁路交通的便利虽然有利于经济的发展，而满铁的方针首先是扶植日本企业和促进日本商品的倾销，满铁的大连中心主意的运输政策，虽然使大连一隅的民族资本均沾利益，而对广大东北地区特别是北部的民族资本却是利少害多。满铁对日本企业的刻意扶持，无疑是在为民族资本树敌。满铁在运输上给予大户的优惠，对中小资本也是变相的打击。

“九一八事变”后，满铁的运输政策更是以使令日本势力迅速扩展到东北

北部，占领全东北市场为目的，给以哈尔滨为中心的民族资本以沉重的打击。在统制经济下满铁优先发送军用品、官用品、社用品，限制民用品的运输，对民族资本更是雪上加霜。

大豆和粮食是满铁货运的主要对象，农产品是东北出口的大宗，它的运费收入是满铁利润的主要来源。“九一八事变”后，满铁对铁路运输实行垄断，对廉价的农产品课以高额的运费，饱受天灾人祸又在经济危机袭击下的农民，在粮价暴跌声中又遭受高额运费的盘剥，苦不堪言。在敌伪实行粮食统制后，满铁实行的运输管制更加重了农民的灾难。

中国民众是养育满铁的上帝，尽管铁路旅客中不乏日本官兵、高官富商和移民浪人，但归根结蒂旅客运输的收入主要来自于中国人民大众。不过满铁对中国旅客的态度极其恶劣，尤其在运营初期，打骂羞辱旅客的事件，层出不穷，构成一大隐患。满铁更以货车载运出关华工，用最恶劣的条件赚取他们的血汗钱。

满铁的运营是建立在剥削成千上万的中国工人的血汗的基础之上的，满铁直接使役的工人从最初的几万发展到几十万人，无论在铁路、煤矿、铁矿、港口，最艰苦最危险的工作都是依靠中国工人完成的，然而，工人所得到的是微薄的歧视性的工资。缺乏最低限度的劳动保护和人身安全。民族的和阶级的矛盾纠缠在一起是满铁内部贯穿始终的基本矛盾。随着满铁的发展，这一矛盾也日益加深和尖锐。满铁的压迫和工人的反抗都在日益加剧。

第八个是满铁与伪满政权的关系

“九一八事变”后，满铁在东北所面对的不再是中国政府而是关东军炮制的伪满政权。满铁是日本的国策公司，伪满政权是日本政府的殖民统治机构，二者都处于关东军的势力之下。伪满政权为满铁的扩张铺路搭桥，满铁则为伪满的经济统制不遗余力。二者是狼狈为奸的关系。

满铁原本不愿伪满政权干涉它的业务，虽然在满铁和伪满政权之间签订了关于“国铁”的委托经营契约，但满铁只愿接受关东军的监督，而不准许伪满政权介入。对于伪满政权来说满铁是个超然的存在。

但随着经济统制的深入和五年计划的推行，伪满政权开始逐步介入满铁的经营，首先是将满铁纳入五年计划、北边振兴计划和物动计划之中，无论是资金、原材料、和劳力的分配，满铁都要受到伪满政权的制约，接着伪满政权认购了满铁的股份成为日本政府之外的又一大股东。随着满铁在日本举债遇到困难，满铁发行公司债也不得不转而依靠伪满政权。

伪满政权推行的经济统制和经济计划也唯有依靠满铁的强大运输力和满铁关系会社网的支撑才能进行下去。满铁还与伪满政权联合进行劳动统制，共同对广大工人实施剥削和压迫。

第九个是满铁与日本移民的关系

从日本来到东北的日本人，很大部分是满铁的社员和他们的家属。他们以满铁为生活来源，可以说是同满铁同呼吸共命运，这部分人是满铁的依靠力量，除少数有觉悟的工人外，几乎全在“社委会”的组织下为满铁的国策使命效力。满铁则保证他们有比日本国内更优厚的待遇。一般情况下，他们和满铁的上层是基本一致的，但在满铁裁员减薪时也有矛盾和冲突。

另一部分是日本工商业者，他们一般是靠为满铁及其社员提供商品和服务为生，可以说是附庸于满铁，他们的利益和满铁是一致的，也经常从满铁获得各种名目的补贴，离开满铁他们一刻也无法存活。

收稿日期：2013年4月26日

日本對中國基督教研究文獻

——以辽宁省图书馆藏 1945 年前出版日文文献为研究中心

吴利薇* 洪晓梅*

摘要: 辽宁省图书馆收藏近 10 万册 1945 年以前出版的日文文献, 其中包括日本研究中国宗教的文献。作者在对辽宁省图书馆馆藏日文文献进行系统整理研究基础上, 揭示日本对中国基督教方面的研究文献。包括这些文献的来源, 出版信息, 写作和出版背景, 文献类型, 文献重点内容, 并对重要文献进行解析。目的是让学术界了解辽宁省图书馆馆藏日文文献, 向中国基督教研究者传递馆藏日文文献信息, 更好地揭示辽宁省图书馆馆藏日文文献, 让更多的研究者利用辽宁省图书馆馆藏文献, 从而使研究者以更广阔的视野, 从不同的视角用全面丰富的史料进行研究。

关键词: 中国 日本 辽宁省图书馆 基督教 研究 文献

辽宁省图书馆的前身是 1948 年成立于哈尔滨的东北图书馆, 是东北地区最大的公共图书馆。近 500 万册馆藏文献中包括大量的古今中外历史文献, 其中包括近 10 万册 1945 年以前出版的日文文献。这些日文文献可以用数量大、品种多、质量高来概括。有一部分日文文献涉及中国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文化、自然资源、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以往学术界重视利用西文基督教文献, 近年来开始注重挖掘、整理、研究、利用汉语基督教文献, 笔者认为也应该同时关注其他语言基督教文献挖掘、整理、研究、利用, 本文将介绍辽宁省图书馆藏日本对中国基督教研究文献。

1. 辽宁省图书馆藏基督教文献基本状况

在辽宁省图书馆藏日文文献中有几千种文献涉及宗教问题, 其中包括近千种涉及基督教方面的文献, 如《基督教大辭典》、《景教の研究》《基督教の哲學的理解》、《天路歷程》、《福音的基督教》等等。其中一部分文献是日本研究中国基督教方面的文献, 虽然涉及日本对中国基督教研究文献种类不是很多, 大约有近百种, 但是这些研究文献的质量很高。日本研究者不但注重搜集与整理中外研究文献, 善于引用欧美研究机构的数据, 尤其善于引用欧美权威文献中的数据, 而且一些研究者还将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应用于中国基督教研究, 进行实地社会调查研究与实证研究, 研究方法细腻, 其中不乏《滿洲宗教誌》、《支那基督教の研究》等日本对中国基督教研究的重要文献。

1, 1 馆藏基督教文献来源

这些日文基督教文献来自很多机构, 经过历史的变迁最终收藏在辽宁省图书馆。笔者通过调查藏书印发现文献分别来自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满铁)奉天图书馆、满铁新京(长春)图书馆、满铁营口图书馆、满铁本溪湖图书馆、满洲中央银行、满洲电业株式会社(满洲电业股份有限公司)、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满洲医科大学图书馆、满洲国立开拓研究所、哈尔滨商工会、支那研究所、抚顺市民众教育馆、辽宁省立图书馆、吉林省立长春图书馆、哈尔滨市立图书馆、中国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东北日报、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图书保存会等机构以及个人藏书, 以原满铁奉天图书馆收藏居多。以下是笔者搜集的藏书印。

* 吴利薇, 女, 辽宁省图书馆研究馆员 沈阳 110015

* 洪晓梅, 女, 东北大学文法学院教授 沈阳 110004



滿鐵奉天圖書館佐原文庫



滿鐵奉天圖書館



滿鐵奉天圖書館



滿鐵新京（長春）圖書館



滿鐵新京（長春）圖書館



滿鐵新京（長春）圖書館



滿鐵營口圖書館



滿鐵本溪湖圖書館



滿鐵本溪湖圖書館



滿洲中央銀行



滿洲中央銀行



滿洲電業股份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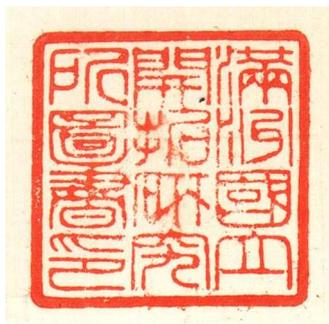
滿洲電業股份有限公司



滿洲電信電話株式會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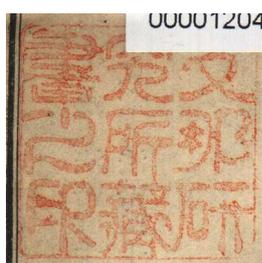
滿洲醫科大學



滿洲國立開拓研究所



滿洲國立開拓研究所



支那研究所



遼寧省立圖書館



吉林省立長春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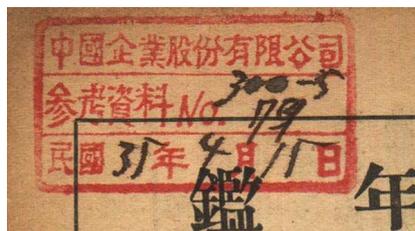
吉林省立長春圖書館



哈爾濱市立圖書館



哈尔滨市立图书馆



中国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东北日报



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



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研究所

1. 2 馆藏基督教文献出版信息

出版时间以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居多。既有由东京岩波书店出版的《奉天三十年》和《西洋人の觀たる支那》，东京大亚细亚建设出版的《满洲生活三十年：奉天の聖者クリステイの思出》，东京春秋社出版的《支那基督教の研究》，东京生活社出版的《支那基督教史》等日本国内出版的文献，也有奉天（沈阳）吐风书房出版的《满洲夜話》，奉天满洲基督教联合会出版的《满洲基督教年鑑》，上海日本堂出版的《歐米人の支那に於ける文化事業》，天津北支那经济通信社出版的《北支·蒙疆現勢》，张家口蒙疆新闻社出版的《蒙疆年鑑》，大连满洲日日新闻社出版的《满洲年鑑》，大连中日文化协会出版的《滿蒙年鑑》等在中国出版的文献。既有平装本也有精装本。大部分是单独出版发行的，也有大型丛书中的一本或者一部分。

1. 3 文献出版时代背景

这些日文文献的写作与出版都是在一个特定历史背景下进行的。日本很早就觊觎中国，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开始有目的有组织地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人员最多时曾达到 2 千余人，因此也形成了数量庞大的“满铁调查资料”，日本学者当时的很多研究项目都是在日本政府组织与资助下进行的。“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后，日本用武力侵略和占领了中国领土，日本侵略者意识到必须在意识形态和文化上侵略中国才能达到奴役中国人民统治中国的目的。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日本对中国的各种研究开始兴盛起来，因此很多日本研究中国基督教文献写作出版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佐伯好郎在《支那基督教の研究》序中写到：“宗教团体犹如所谓第五列，就是第五列部队” 宗教涉及人的思想意识。他发现欧美列强在中国除了经济活动之外，宗教活动是更广义的舞台。因此他认为研究中国基督教不仅仅是研究传教事业，而应该研究欧美列强对中国的宗教政策。同时认为当务之急是从思

想谋略的角度研究中国基督教。

1. 4 日本学者研究动机

宗教涉及人的思想意识, 宗教研究也不可能单独孤立的存在, 是在一个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传播基督教不仅是传播宗教, 《中国基督教史》作者比屋根安定在自序中写道: 七七事变后, 日本需要在中国建立与经营宣传和文化事业时, 从研究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播基督教开始着手, 研究基督教不仅是研究信仰问题, 而最重要的是日本人应该参考借鉴基督教是如何在中国发展各种事业的。研究中国基督教史, 主要是研究基督教是如何触及中国人的灵魂。基督教在中国的势力, 犹如欧美在经济、外交、文化上对中国侵略一样重要。他主张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要向基督教传教士向中国进行宗教渗透一样。由此暴露出日本学者之所以卖力气, 下工夫进行中国基督教研究, 是为了在意识形态和文化上侵略中国, 从而达到奴役中国人民统治中国的目的。

1. 5 文献价值

辽宁省图书馆馆藏日文基督教资料是珍贵的历史文献, 不仅具有文献研究价值, 作为历史的见证, 对研究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发展历史, 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外交、社会、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发展历史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

2. 辽宁省图书馆藏基督教文献类型

辽宁省图书馆藏日本对中国基督教研究文献中既有专门研究基督教的文献, 也有政治、外交、社会、历史、文化、教育类文献中有涉及中国基督教的内容, 一些统计年鉴史志类型文献中也有涉及基督教的内容。

2. 1 宗教类文献

《支那基督教の研究》、《支那基督教史》、《支那西教史考》、《支那天主公會の實情》、《大支那大系: 思想·宗教篇》、《滿洲基督教史話》、《滿洲宗教誌》、《滿洲基督教年鑑》等专门从宗教角度研究基督教的文献, 这些文献信息量很大, 中国基督教研究者可以从中获得全面的、系统的、有价值的研究信息。

2. 2 政治类文献

由于政治对基督教的传播与发展有深刻的影响, 《支那問題辭典》、《近代支那の政治及文化》、《西洋人の觀たる支那》、《支那思想のフランス西漸》、《亞東指要: 支那滿洲朝鮮案内》、《現代大支那》、《北支·蒙疆現勢》、《中華外人物語》等政治类文献中都有涉及基督教问题的内容。

2. 3 外交类文献

《近世支那外交史》、《支那近代外國關係研究》、《支那と米國との關係》、《中國に於ける外國人の地位》、《中華民國に於ける外國人の地位》、《歐米に於ける支那研究》研究中国外交问题文献中有关基督教问题占很大篇幅, 说明基督教问题在中国外交史上是一个重要问题, 基督教的传播与国家、民族利益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 反映出中国外交史的一个侧面。

2. 4 文化类文献

在《東洋文化史上の基督教》、《歐米人ノ支那ニ於ケル主ナル文化事業》、《歐米人の支那に於ける文化事業》、《支那に於ける外人の文化事業論》、《世界文化史大系——明の興亡と西力の東漸》、《世界文化史大系——清代のアジヤ》、《東洋文化史大系——明の興亡と西力の東漸》、《東洋文化史大系——清代のアジヤ》、《支那文化と支那學の起源: 支那思想のフランス西漸》、《東洋文化史: 稿本》、《東洋文化西漸史》等日文文献中, 日本研究者从东方文化、西方文化、东西方文化交流与融合, 以及西方文化向中国渗透与发展的角度研究

基督教对中国文化以及社会的影响。

2. 5 反映中国东北基督教发展历史的文献

基督教十七世纪由罗马天主教会传教到中国东北。从《满洲基督教史话》、《满洲基督教年鉴》、《满洲宗教誌》、《奉天三十年》、《满洲生活三十年：奉天の聖者クリスチの思出》、《满洲夜话》、《满蒙探検四十年》、《奉天を中心こせち外人傳道師の足跡》、《满蒙探検四十年》、《南满洲ニ於ケル宗教概観》、《满洲に於ける天主教》、《海北鎮とルーヴェン》、《韃靼》、《满洲文化史上の一挿話：奉天が生んだ世界的の詩編》等文献中可以反映基督教在中国东北传播与发展的历史，以及基督教对东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医疗卫生、慈善事业、民众生活的影响。

2. 6 统计年报年鉴史志类型文献

在《满蒙年鉴》、《满洲年鉴》、《满洲帝國年報》、《蒙疆年鉴》、《支那年鉴》、《大陸年鉴》、《民生年鉴》、《奉天市統計年報》等日文文献中的宗教部分用文字描述或者统计数据来表述基督教。

《满洲帝國年報》中天主教会布教人数、信徒人数统计表统计事项如下：省市區、教会、布教人数（男、女、总人数）、信教人数（男、女、总人数）。基督教会布教人数、信徒人数统计表统计事项如下：省市區、教会、布教人数（男、女、总人数）、信教人数（男、女、总人数）

《民生年鉴》在第九章宗教第四节基督教中包括如下统计数据：天主教、教区别、传教士国籍、区内市县旗数。由于耶稣教有许多派别，《民生年鉴》还将当时在中国东北的主要派别列出清单。

2. 7 翻译西文文献和西方研究中国文献综述类文献

从《グスマン東方傳道史》、《支那西教史考》、《東西交渉史：支那及び支那への道》、《中華外人物語》、《西洋文化の支那侵略史》、《景教東漸史：東洋の基督教》、《元主忽必烈が歐洲に派遣したる景教僧の旅行誌》、《奉天三十年》、《满洲生活三十年》、《满蒙探検四十年》、《歐人の支那研究》、《歐米に於ける支那研究》等文献中可以看出日本研究者善于搜集与整理欧美学者对中国基督教研究文献。

总之日本对中国基督教研究文献不但种类多样，而且内容丰富。

3. 辽宁省图书馆藏日本对中国基督教研究重要文献解析

在辽宁省图书馆馆藏日本对中国基督教研究文献中有一些是重要文献，笔者选择几种对其进行解析。

3. 1 《中国基督教研究》（支那基督教の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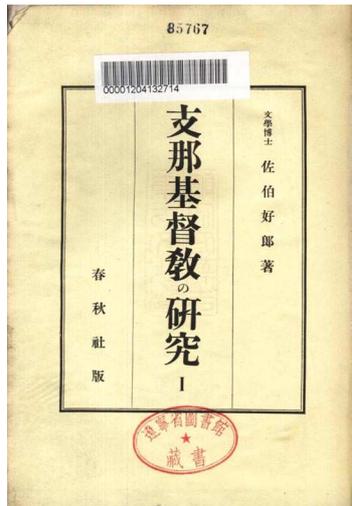
《中国基督教研究》（1、2、3卷）1943年7月至1944年8月，由东京春秋社出版，著者为佐伯好郎，这三部书为海内外学界所瞩目，被称为中国景教研究的权威之作。

佐伯好郎 1871 年出生于日本广岛，1890 年毕业于东京专门学校司法科，之后在北美进修，担任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曾留学欧美、漫游中国、留学中国，从 1922 年开始在日本明治大学讲授罗马法课程。由于景教研究的成绩，1941 年而获得东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由于景教研究对文化的贡献，1942 年获得财团法人国民学术协会颁发的奖牌。

该书为作者 1925 年 5 月开始到 1935 年 5 月，承担日本东方文化学院研究课题“元明清三朝中国基督教”研究报告书，之后在增补修订后增加唐宋时代中国基督教研究资料后，改称中国基督教研究，同时在获得欧洲列强与中国宗教政策

有关的资料的基础上完成该书的写作。

作者发现中国当时有基督教教徒三百万余人,将来有可能达到六百万或者一千万人。作者认为应该观察传播到中国基督教各个派别本质,研究宗教在中国的活力。各个时代基督教是如何在中国布道传教的,基督教所涉及的中外人物,外国传教士对中国帝王、官员、学者的影响。基督教传来的路径,发现外国传教士布道传教方针、策略、手段、方法,为日本人提供借鉴。研究中国基督教的目的是为了达到日本侵略者统治中国的目的,把所谓西洋的基督教作为大东亚宗教一部分,或者把其作为一个大问题,把握其洞察力、预见能力与判断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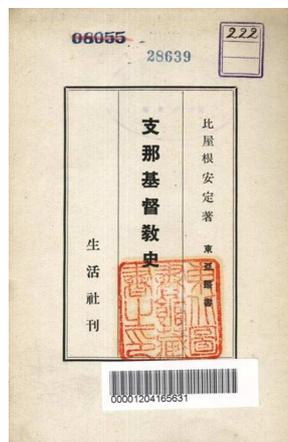
《中国基督教研究》书名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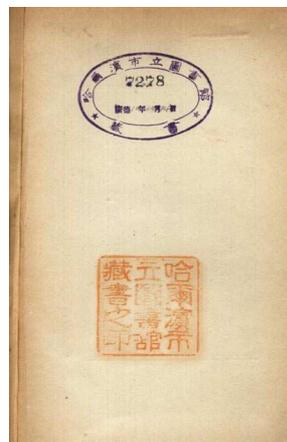
《中国基督教研究》插图敦煌景教画像

3. 2 《中国基督教史》（《支那基督教史》）

东京神学大学宗教史教授比屋根安定著《中国基督教史》1940年7月由东京生活社出版发行。全书共分七篇，二十三章。第一篇支那基督教史序说，第二篇景教派基督教传来，第三篇天主教基督教派初传，第四篇耶稣会活动以及争论，第五篇清朝天主教基督教，第六篇耶稣基督教开教，第七篇清末以及民国基督教比屋根安定认为研究中国基督教史有如下必要性：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史是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基督教存在于中国思想史中，基督教促进西方技术向中国传播，基督教作为传播媒介使东西方互相接触。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历史是中国外交史的一个侧面。



《中国基督教史》书名页



《中国基督教史》藏书印

3. 3 《欧美人在中国的文化事业》(歐米人の支那に於ける文化事業)

该书的写作、出版、发行都在中国上海。作者山口昇在中国海关工作,在上海工作期间,得到佐原研究室提供调查资料与支持写作该书。佐原研究室的创办者佐原笃介,日本东京时事新报社派驻上海记者,26岁到上海,在上海生活三十年,有“沪上槎客”之称,为研究中国,有目的地搜集中国政治、经济、哲学、文艺等方面文献。该书为日华事业协会的公开出版物。由在上海文路的日本堂书店出版发行,第一版出版于1921年12月,1922年1月再版,共1371页,书中有32幅珍贵历史图片,包括人物、教会、教堂、学校、医院、徐家汇天文台。该书由原满铁奉天图书馆收藏,现在收藏在辽宁省图书馆。

作者不是天主教徒,但是他发现传教士在中国建立宏大的建筑,法国人天主教名下经营的法兰西天主教文化事业,最著名的是最初的上海徐家汇天文台。传教士的声望甚至压过官宪,有的时候为了教徒的利益可以左右法官。作者认为研究中国应该依靠文化政策和文化生活的研究,因此有必要先彻底研究欧美等外国人在中国的文化事业。作者以欧美在中国的基督教发展为研究中心,主要从记述文化事业的角度,研究欧美人是如何在中国建立地盘与经营,其枝叶如何繁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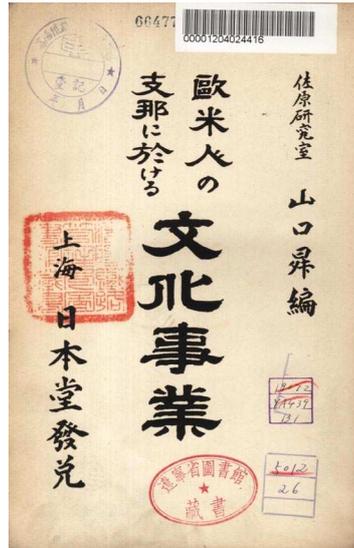
当时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不如外国文化教育事业发达,政府举办国立大学仅有北京大学、交通大学,而欧美人经营的文化事业分布在北京、天津、上海、苏州、杭州、南京、汉口、成都、福州、广东、香港等地,到处都有,而且设备整齐先进,教育水平已经达到相当程度。该书共分四卷(第一卷教会,第二卷学校,第三卷医院,第四卷其他公益设施)。

第一卷教会,主要写基督教在世界发展与传入中国过程,当时在中国的发展状况,传教士以及教会问题所引起的交涉。值得一提的是,第一卷第七章欧美在中国教会名称,是研究基督教在中国发展非常详细的珍贵的历史资料,详细记录了201个中国教会的情况,其中包括传教国家名称、教派名称(西文)、略号(西文缩写)、教会汉语名称、教派本部所在地、在中国开始传教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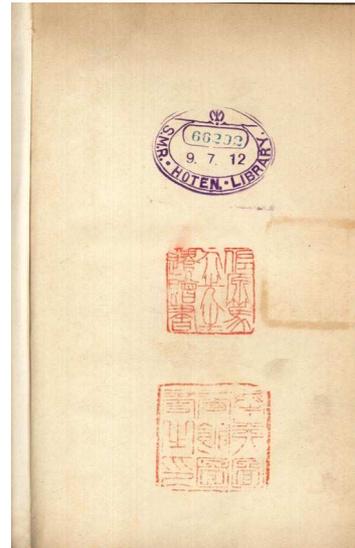
第二卷学校,第二卷学校第一节依据1920年英文教育年鉴(イウアンス)编写的与外国人有关的中国各种学校统计表,不但是研究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资料,也是研究中国教育史的珍贵资料。按照中国的省份来编写,包括该省份的人口、面积,各种学校的数量,其中有与外国传教士有关的学校的详细统计表,统计表包括学校所在地、学校名称、所属教会、创立时间、男学生人数、女学生人数、年龄、学费、外国教师人数、中国教师人数。学校卷详细研究中国各个省市与教会有关的各种学校。有趣是该书是日文文献,可是写到香港大学时,却附上50页的英文资料。

第三卷医院 第一节中国与传教有关的医疗统计表不但是研究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资料,也是研究中国卫生事业发展的历史资料。该统计表包括省份名称、人口、传教医士、传教士总数、教会与医士、一名医士为多少人口服务。

第四卷其他公益设施,第四卷介绍了在北京、山东、汉口、上海、四川等地由教会创办的救济院、孤儿院、藏书楼、图书馆、博物馆、安老院等各种公益设施。



《欧美人在中国的文化事业》书名页



《欧美人在中国的文化事业》藏书印



《欧美人在中国的文化事业》插图
奉天医科大学第一届毕业生



《欧美人在中国的文化事业》插图
徐家汇天文台

3. 4 《满洲宗教志》(滿洲宗教誌)

芝田研三著《满洲宗教志》由大连满铁社员会，1940年7月出版发行。该书是在满铁铁道总局弘报课进行宗教调查研究基础上编辑出版的宗教文献，因为是调查性资料，因此该文献既有历史回顾，也有现状描述，具有调查事项全面、数据详细、统计表多的特点。该书第六章介绍天主教及基督教(206-343页)

按照东北地区当时基督教三个教派罗马天主教、耶稣基督教、希腊正教分别来介绍。书中插入 57 幅照片，有呼兰基督教堂、大兴安岭上的教堂、哈尔滨圣尼古拉教堂等 10 幅与基督教有关的照片。当时哈尔滨每年 1 月 19 日，在松花江上用俄语进行洗礼祭祀，这种祭祀仪式在全世界都是珍稀的，因此《满洲宗教志》中插入的冰上十字架、松花江洗礼祭祀照片是非常珍贵的历史照片，应该是东北地区基督教独有的，不但体现了鲜明的东北地域特色，而且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

第六章第一节中 1983 年 7 月制作的当时东北地区天主教教势统计一览表，包括信徒总数、洗礼志愿者数等三十一个统计事项，每个事项都有详细的调查统计数据。详细介绍当时东北十一个天主教教区(奉天教区、抚顺教区、四平教区、林东教区、吉林教区、齐齐哈尔教区、延吉教区、佳木斯教区、热河教区、赤峰教区、哈尔滨俄罗斯人教区)状况，介绍每一个教区时都有包括信徒数量、传教士数量等二十几个统计事项教势统计表，是研究东北地区基督教发展的有价值的

历史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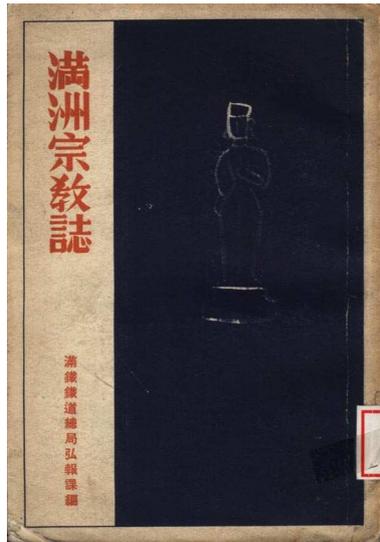
第六章第二节介绍了当时在东北地区的苏格兰长老会、爱尔兰长老会、丹麦路得教会三个基督新教教派状况。用教会经营学校调查表、教会经营医院、施养院调查表、各教派教势统计表（统计事项包括：教派名称、略称、事务所地址、代表者姓名、教会数量、教会工作人员数量、信徒数量、经常费年额）、基督教新教各派统计表（统计事项包括：省名、教会堂、布教所数量、教师数量、信徒数量）等各种统计表来描述耶稣基督新教教派状况。

第六章第三节介绍希腊正教。介绍希腊正教教会创立起源，主要寺院历史沿革。用包括寺院名称、寺院所在地、寺院建设时间、寺院神职人数、寺院收支状况、备注事项的统计表描述希腊正教当时的状况。俄罗斯人信奉希腊正教，由于中东铁路的建立，以哈尔滨为中心在中东铁路沿线建立很多希腊正教教堂。书中详细介绍希腊正教哈尔滨教区。有希腊正教哈尔滨教区监理局组织表、哈尔滨教区监理局职员表（1938年7月1日调查）、各地出生、死亡、结婚统计表（1937年度）。介绍包括马家沟、齐齐哈尔、绥芬河、一面坡等十一个希腊正教哈尔滨教区管区内所属寺院详细状况，苏联直辖寺院状况，寺院收支状况。希腊正教慈善事业描述的也很详细，统计事项如下：地址、创立时间、经营主体、创立者、代表者、创办目的、组织、历史沿革及事业现况、收容人员、经费等。

该书 425 页所附的“满洲国暂行寺庙以及布教者取缔规则”说明日伪当局对宗教的控制，以及利用宗教达到统治中国东北的目的。

《满洲宗教志》在书后列出了资料索引，笔者认为这些文献是研究东北基督教问题的重要文献，将其中与基督教有关的文献按照图书题名、作者、出版社、出版时间顺序列出，以便为研究者提供文献线索。

1. Missions of the United free church of Rev. Daniel. Edinburgh T. R obertson .Scotland Our Mission in Manchuria 1913 年
2. A century of Mission in shanghai shanghai 1907 年
3. Chuschand missions in Manchuria A.R. Mackenzie London 1928 年
4. Rewiniscence Rev. T. C. Fuluno 锦县 1934 年
5. 滿洲長老會布道七十年之會回顧. 滿洲長老會. 1937 年,
6. 滿洲長老會第二十回大會議事報告書. 滿洲長老會. 1936 年 7 月,
7. 滿洲傳道會報告書. 东京富士见町教会. 1934 年 10 月,
8. 聖者クリステイ師奉天生活三十年. 卫藤利夫. 大亚细亚建设社. 1934 年
9. 韃靼. 卫藤利夫. 满铁社员会. 1938 年
10. 南滿洲に於ける外人經營の文化事業調査. 蓼沼强. 满铁地方部. 1937 年
11. 歐米人の支那に於ける文化事業. 山口昇. 上海日本堂书店. 1922 年
12. 滿洲帝國とカトリック教. 田中芳五郎. 东京カトリック中央书院. 1935 年
13. 滿洲帝國天主教教務年鑑（法语、汉语两种语言）. 奉天天主堂. 1937 年
14. 滿蒙全書第一卷：滿蒙の宗教. 上村哲彌. 满铁調査課. 1913 年
15. 南滿洲ニ於ケル宗教概観. 松尾为作. 教化事业奖励资金财团. 1931 年 7 月
16. 宗教資料調査第五輯：滿洲宗教概要. 伪满洲国民生部社会司礼教科. 1938 年 10 月



《满洲宗教志》封面



《满洲宗教志》插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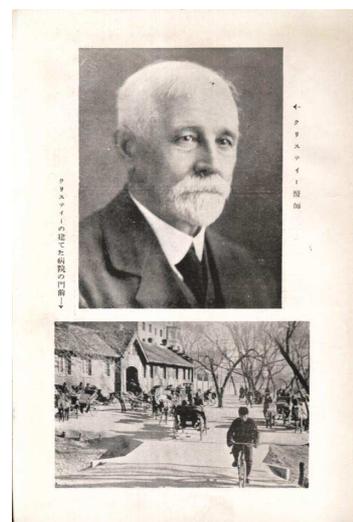
3. 5 《满洲基督教史话》(满洲基督教史話)

竹森满佐一著《满洲基督教史话》东京新生堂 1940 年 3 月出版。竹森满佐一从事中国东北基督教史研究，曾经得到过满铁奉天图书馆馆长卫藤利夫的指导，让其自由地利用满铁图书馆，向其介绍东洋文库，在卫藤利夫的影响下，开始进行东北基督教史研究。写作该书过程中参阅“福音新报”，该书不仅追溯东北基督教历史，也反映三、四十年代东北基督教发展的状况。竹森满佐一曾经与奉天神道院长以及神道院密斯凯林（ミスケリン音译）博士深谈过，得到他们帮助。满洲长老会的杨广恩、李廷魁也帮助他解决很多疑问。基督教文化学会授予竹森满佐一 1939 年度研究奖励金。

该书共分为十二部分。著者在序言中说研究东北基督教的文献比较少，以西文文献为主，除此之外还有卫藤利夫著《满洲生活三十年》、《鞞鞞》（昭和十年），矢内原忠夫翻译《奉天三十年》（昭和十三年），大井二郎著《满洲にける天主教》。庄振声著《满洲基督教长老会修道七十年之回顾》（康德四年）、《满洲基督教年鉴》（康德五年）、《英国圣书公会报告》《满洲长老会大会记录》等文献。



《满洲基督教史话》书名页



《满洲基督教史话》插图

结束语

这些日文文献不仅对研究基督教在中国传播与发展有独特的价值,而且是研究中国历史与社会发展珍贵的历史文献。笔者写本文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揭示辽宁省图书馆馆藏日文文献,让学术界了解辽宁省图书馆馆藏日文文献,向中国基督教研究者传递馆藏日文文献信息,使更多的研究者利用辽宁省图书馆馆藏文献,从而使研究者以更广阔的视野,从不同的视角用全面丰富的史料进行研究。

参考文献:

1. 佐伯好郎. 支那基督教の研究(1、2、3卷). 东京: 春秋社, 1943. 7-1944. 8
2. 比屋根安定. 支那基督教史. 东京: 生活社, 1940. 7
3. 山口昇. 歐米人の支那に於ける文化事業. 上海: 日本堂书店, 1922. 1
4. 竹森满佐一. 滿洲基督教史話. 东京: 新生堂, 1940. 3
5. 芝田研三. 滿洲宗教誌. 大连: 满铁社员会, 1940. 7.

收稿日期: 2013年8月2日

湯爾和與《滿鐵外交論》

许勇

话说民国十九年(1930),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满铁外交论》,作为「东省丛书」的一种,这本 148 页“研究各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日、俄、美)围绕争夺“满铁”路权而展开的外交斗争与对国际政治的影响”的小册共分 10 个部分,主要内容包括美国铁道“大亨”Harriman 氏组织的“美国银公司”企图收买南满铁路的失败,各帝国主义国家对吉长线、法库门铁道、安奉线、锦绥铁道、中东路等线路权问题所持态度及其相互斗争的情况,中国政府当时对各具体问题的态度、立场、政策及外交措施等。

该书的目录如下:

第一 研究满铁中心外交之意义及其重要

第二 Harriman 氏收买满铁之失败

(1) Kennan 氏著 Harriman 传所记收买满铁之失败

(2) 收买满铁失败之批评

第三 吉长线问题附吉会线问题

第四 法库门铁道问题

第五 安奉线问题

第六 满洲各路中立问题

(1) 美国提议

(2) 英国态度

(3) 俄国态度

(4) 德国态度

(5) 日本态度

(6) 总括美国提议之真因与中国之态度

第七 锦璦铁道问题附四国借款之失败

(1) 满洲各路中立交涉中之锦璦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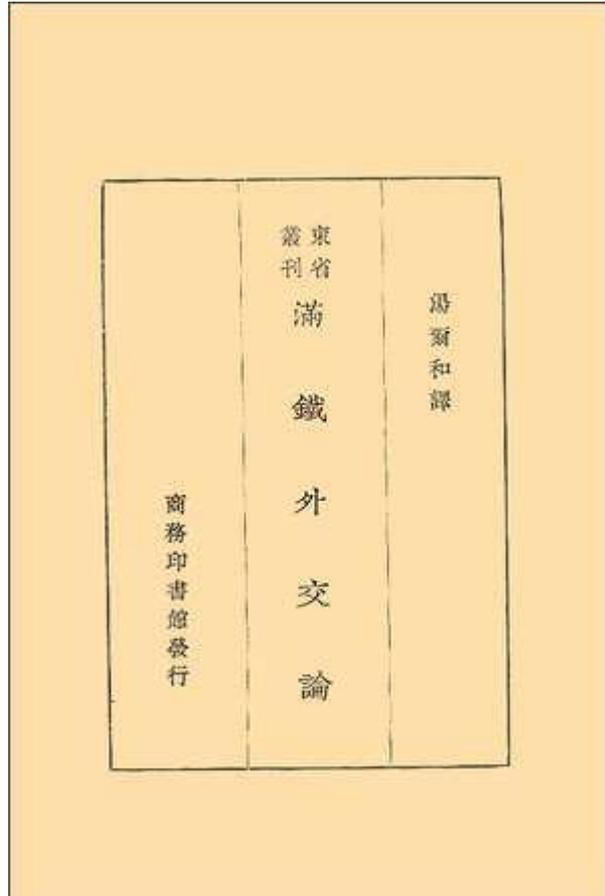
(2) 锦璦线利权之内容

(3) 锦璦铁道问题之结末

(4) 四国银团之失败

第八 四国银团失败后之外交

(1) 经安东路货物之减税会约



- (2) 日本取得满蒙五路敷设权及其交通网之支配
- (3) 中日交涉之满铁
- (4) 石井蓝辛协定
- 第九 中东路与日美及中俄外交
 - (1) 日美外交之前提
 - (2) 技术部与日美之对抗
 - (3) 中俄外交
- 第十 总括
 - (1) 归纳的总括
 - (2) 演绎的总括
 - (3) 太平洋外交之原理以及满铁为中心外交之现代地位
 - (4) 关于中国问题研究法之注意

除了《满铁外交论》之外，这本书的责任者还翻译或译述了多本与满铁相关的书，例如《吉林省之林业》（南满铁路调查课编 商务印书馆 1930）、《到田间去》（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农事试验场编 商务印书馆 1933）、《北满概观》（哈尔滨满铁事务所编 商务印书馆 1937）。

翻译了这么多满铁编辑的专著，译述者想必是位精通日语，熟悉轮轨的铁路人士，其实不然。这位译述者谙熟日文不假，但与铁路毫不搭界，他是一位医学博士，他叫汤尔和。

汤尔和（1878~1940）字调鼎，晚号六松老人，浙江杭州人，清光绪廿六年（1900），在杭州养正书塾读书，师从陈黻宸，与马叙伦同窗。廿八年（1902），随师陈黻宸在上海创办《新世界报》。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汤尔和留学日本，就读于成城学校，初学军事，期间加入同盟会。是年四月初三日，五百余名中国留学生集会于东京锦辉馆，在声讨俄国侵略行径之后，决议成立拒俄义勇队，汤尔和被推为拒俄义勇队临时队长，和钮永建归国，谒北洋大臣袁世凯请缨，无果南归。次年，任浙江高等学堂音乐教员。

清光绪卅三年（1907），汤尔和再次留学日本，入金泽医学专门学校改学医学。后又留学德国，获柏林大学医学博士学位。清宣统二年（1910）回国，任浙江高等学堂教务长兼校医，并当选浙江谘议局谘议。同年创办浙江病院，自任副院长兼内科医师。



1911年武昌起义后，汤尔和代表浙江赴武昌，出席各省都督代表会议，12月14日，在南京的全体代表会议上（15省，42人），被选为临时议长。

民国元年（1912）初任浙江都督府民政司佥事，同年10月，受政府委托，在北京筹办中国第一所国立医学校——北京医学专门学校（今北京大学医学部前身），并两度出任该校校长（1912.10~1915.12、1916.8~1922.4）。1915年，汤尔和创立中华民国医药学会并任会长。

民国十一年（1922）7月任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长，9月任教育总长。民国十

五年(1926)10月任内务部总长,次年改任财政部总长兼盐务督办。民国十八年(1929)3月再赴日本留学,获日本帝国大学医学博士学位。民国十九年(1930)后,历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议、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行政院驻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参与与日本谈判并签订《塘沽协定》。

1935年被日本指定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1937年卢沟桥事变时,汤尔和正在日本,闻讯急忙赶回北平。1937年10月,日本扶植汉奸筹建统一的华北伪政权,以王克敏、董康、汤尔和、朱深、王揖唐、齐燮元等为伪“政府筹备处”成员。12月14日,华北伪组织和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合并,在北平成立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责任内阁设行政、议政、司法3个委员会,分掌行政、立法、司法权。以王克敏为行政委员会委员长,汤尔和为议政委员长,董康为司法委员长,以王克敏、王揖唐、江朝宗、齐燮元、朱深等为临时政府委员。下设6部:行政部总长王克敏,治安部总长齐燮元,教育部总长汤尔和,赈济部总长王揖唐,实业部总长王荫泰,司法部总长朱深。

至此,汤尔和已成为彻头彻尾的汉奸。

1940年3月,汪精卫的伪政府在南京成立,北平伪“临时政府”改称华北政务委员会,汤尔和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委兼教育总署督办。当时他已患肺癌卧床不起,署务由伪教育总署署长方宗璠代理。

1940年11月8日,半世英名,晚节不保的汤尔和,因肺癌病死于北平,终年62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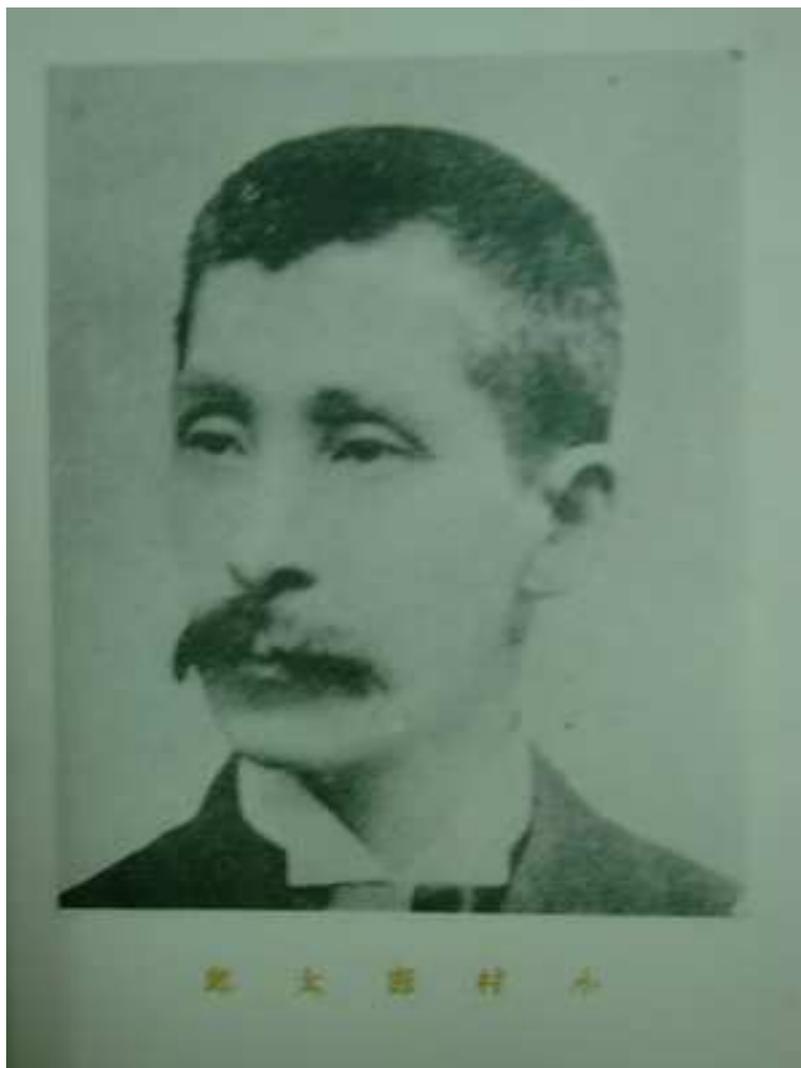
汤尔和一生亦学亦官,或许是“政务”繁忙无暇专著,故所撰多为译著,除了上述涉及满铁的译述外,还有医学类的《组织学》、《生物学精义》、《精神病学》、《近世妇人科学》、《诊断学》等。

關於小村壽太郎功德碑

周爱民

(旅顺日俄监狱旧址博物馆)

旅顺日俄监狱旧址博物馆现藏“小村寿太郎功德碑”一通，碑身纵 151 厘米，横 241 厘米，厚 20 厘米，重约 2.5 吨，正面左右下角均残缺。碑主是日本侯爵、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1855—1911 年）。



小村寿太郎作为日本明治时期的外交官，在日本外交史上曾有着“卓越”的表现。由于他的外交生涯与日本“大陆政策”的形成与发展恰好一致，所以在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每一个重要问题上，他都充当了急先锋。“小村寿太郎功德碑”碑文即概述了他在日本外交史上“丰功伟烈中外”的事迹，特别是对其在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建设中的“伟勋”尤加赞扬。

“小村寿太郎功德碑”碑文为竖行阴刻日文，有 38 行，具体内容（译文）如下：

这是侯爵小村寿太郎阁下的塑像，侯爵在帝国外交史上立下了丰功伟绩，扬名内外受到敬仰，尤其在满洲更为驰名。忆往昔在日清战争当中，侯爵作为代理公使出任清廷之际，

也正是与清廷断绝外交关系之时，后作为民政长官绥靖占领地立下功劳。俄国乘义和团之乱占领了满洲，并企图吞并满洲。侯爵以公使名义出使俄国和清国。后来作为日本外务大臣，他始终如一地揭穿和扼制了俄国的阴谋。并警告了俄国及清国的挡道行为，他不但无视俄国要求缔结归还满洲的条约，更拒绝从满洲撤兵。进而上奏朝廷要求强化对占领地的控制，他为了主张尊重我方在条约上的权益，经朝廷的裁决，他开始向俄国进行伸缩外交竞达半年之久。侯爵以病躯之身，举躬尽瘁，他参与了日俄讲和会议，而达成了撤兵满洲的协议，同时也达成了长春以南的铁路以及辽东斗岛的租借地的转让问题和韩国的自身自由问题等。他成功地达成了可能构成我方交战目的的主要要求。他为向朝廷回奏国事，在横滨港一上陆，就耳闻朝廷已同美国哈利曼财团，达成了一项以南满铁路及其附属一切利权为条件和美国签订了一项错误意向书，侯爵考虑到问题的严重性，他挺身而出，尽力说服朝廷取消该协定而成功。他更以疲惫不堪之躯出使清国，议定了占领地满洲的善后条约，且向清国说明我对南满铁道以及有争议的韩支铁道不铺设的承诺。更对在满洲的治安保证，施政的改善等重大问题，都是为了帝国在满洲的安危起见。他卓识的远见，尤同神明一般。在明治四十二年美国向我方提议将满洲铁道国际化的要求，于是侯爵再次出任外相，抨击了这种做法是破坏了俄国讲和条约中所规定的条款。同时又同俄国一起协商挫败了美国主张的锦瑗铁路的铺设计划。回顾满铁之所以有今日，之所以满洲呈现了王道乐土以至发展到满洲的建国，皆是侯爵的高瞻远瞩，卓越见识所在，早已奠定了基础的缘故。故满铁社员鉴于形势的要求，首先提议藉纪念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创业三十周年之际，由该社干部建议：有关东军、关东局、驻满洲帝国大使馆满洲国、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及满铁社员会，在满有力社团以及全满洲官民有志之士等发起，相互协商，在此建立侯爵铜像，以供朝夕瞻仰，永矢不忘其英姿，昭扬其丰功伟绩也。

昭和十三年五月三十一日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
 总裁 松冈洋右



松冈洋右(1880—1946年)，日本侵略扩张思想的顽固继承者和狂热鼓吹者，曾任日本驻华、驻俄、驻美外交官，以及“满铁”头目。在日俄战争中，他以外交官的身份大搞军事间谍活动，积极为日本政府搜集有关沙俄军队的情报，并因此得到日本政府的赏识。1921年7月任“满铁”理事，组建情报调查机构。1927年7月至1929年8月担任“满铁”第十任副社长。1935年8月至1939年3月，

担任“满铁”第十四届总裁。既同是外交官出身，又同是“侵华之急先锋”，所以由松冈洋右为小村寿太郎撰写碑文就不足为奇了。

松冈洋右在碑文中极尽吹捧之能事，将小村寿太郎美化成“尤同神明一般”的人物。本文则欲借碑文中提到的相关事宜，还原小村寿太郎“侵华之急先锋”的真实面目。

一、小村寿太郎其人

小村寿太郎，1855年（安政二年）9月26日出生于日本西海道的日向国饩肥藩士家庭。父亲贯平，母亲梅子。小村寿太郎于1861年（文久元年）入振徳堂藩校学习，1869年（明治二年）毕业。1875（明治八年）以文部省首届毕业生赴美留学，学习法律科。1880年（明治十三年）由美留学归国，在司法省任职，先后任上等裁判所判事、大审院判事等职。1884年（明治十七年）任外务权少书记官。1886年（明治十九年）升任外务省翻译局次长，1888年（明治二十一年）任翻译局局长。1893年（明治二十六年）10月，因得到伊藤博文内阁外相陆奥宗光的赏识，以驻华使馆参事官身份任临时代理公使。

小村寿太郎是积极主张侵略中国的所谓“日清开战论”倡导者，被称为“开战之急先锋”。出任驻华代理公使后，他竭力搜集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产业、民族风俗，以及列强在华活动等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回本国”。由于小村寿太郎身材矮小，为人狡猾奸诈又善于盗窃情报，到任后不久，北京外交使团各国公使就送给他一个“鼠公使”的绰号，以讽喻他向老鼠一样狡黠机诈。

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后，小村寿太郎被任命为驻朝公使。1896年经陆奥宗光推荐，任外务次官。1898-1900年先后任驻美、俄公使。1901年转任驻华公使，参与八国联军侵华活动及《辛丑条约》的签订。1905年以全权代表身份出席朴次茅斯会议，签订日俄《朴次茅斯和约》。1908-1911年任第二次桂内阁外务大臣，签订《日俄密约》、吞并朝鲜、收回关税自主权。1911年11月病死，被授予侯爵。

二、小村寿太郎与中日甲午战争

1894年2月15日，朝鲜东学党武装起义在全罗道古阜郡爆发。日本政府决心利用朝鲜东学党事件，以保护驻朝使馆、侨民为名，派兵入朝。为了制造挑起战争的借口，6月7日，日本政府训令小村寿太郎照会清政府，以朝鲜现有变乱重大事件为由，提出日本拟出兵入朝的要求。9日，清总理衙门据理驳斥日本的照会，但日本已派兵从广岛的宇品港出发，于朝鲜仁川登陆。12日，小村寿太郎再次向清政府提出强硬照会，坚持要派兵入朝。17日，日本政府又提出了共同改革朝鲜内政的无理要求，中国政府予以断然拒绝，认为“止可由朝鲜自行厘革，中国尚不干预其内政，日本素认朝鲜自主，尤无干预其内政之权”。理屈词穷的日本政府无言以对，22日，由小村寿太郎再次照会清政府，提出即使中国不答应日本的要求，日本也绝不撤离在朝军队的无赖要求。此被称为日本对中国的第一次绝交书。

7月9日，经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的斡旋，小村寿太郎与清总理衙门大臣奕劻会晤，商讨朝鲜事件。奕劻提出，日本必须先从朝鲜撤军，然后才能商讨韩事，小村寿太郎愤然离席，会谈终止。陆奥宗光接到报告后，决定趁此机会与清政府彻底摊派。12日，小村寿太郎收到陆奥宗光“向中国提出第二次绝交书”的电令，并于14日向中国提交照会，指责中国要求日本从朝鲜撤兵，是“徒好生事”，甚至威胁说：“将来即发生不测之变，日本政府不任其责。”23日，日军占领朝鲜王官。25日，挑起丰岛海战。8月1日，日本正式向中国宣战。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清政府开始驱逐日本公使。小村寿太郎在完成了通过外交手段发动侵华战争的任务后回国，受到日本政府的嘉奖，并被任命为战地行政官，随同山县有朋的第一军赴朝，从事新的侵略活动。1894年10月25日，日本第一军攻陷九连城、安东县。并在安东县设立“军管民政厅”，小村出任民政长官，开始对中国东北实行殖民统治。

三、小村寿太郎与《朴茨茅斯和约》的签订

日本外交官本多熊太郎(1874-1948年)曾著有《胆略外交》一书，其中对小村寿太郎在日俄战争中所起的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日俄战争是因为有小村才发生。如果没有小村，就不会爆发日俄战争……至少那个时期有这种说法。我至今依然确信无疑。”本多熊太郎1901年担任小村寿太郎的秘书，并随同其参加了日俄朴茨茅斯和会。作为曾经的跟随者，他对小村寿太郎的评价难免溢美之词过多，与史实不符，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小村寿太郎“开战之急先锋”的作用。

1904年2月8日，日俄战争爆发，这场耗时20个月的战争是日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无视中国主权，为争夺殖民地而进行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无尽的屈辱和深重的灾难。

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俄双方在美国总统罗斯福的调停下，在美国朴茨茅斯海军基地举行和谈。9月5日，小村寿太郎作为日方全权代表与俄方全权代表维特签署了《朴茨茅斯和约》。该条约包括正约15条，附约两条。其主要内容：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独占利益；俄国将辽东半岛租借权和南满铁路（旅顺至长春等支线）及有关特权转让给日本；俄国将库页岛南部让给日本。《朴茨茅斯和约》的签订标志着日本和俄国对中国东北开始重新瓜分，为后来日本帝国主义“经营满洲”，建立满铁，奠定了第一个国际法基础。

日俄双方虽然签订了《朴茨茅斯和约》，但若把条约利益变为现实利益，还必须得到清政府的允诺，因为条约规定，关于中国东北权益事项，“须商请清国政府承诺”。于是，尽快与中国政府交涉，落实《朴茨茅斯和约》利益就成了日本政府的当务之急。

1905年11月16日，日本外相小村寿太郎率领参加日俄朴茨茅斯和会的原班人马来到北京，由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康哉（后任满铁第十二任总裁）辅佐，同以庆亲王奕劻为首席全权代表的清政府代表举行谈判。谈判期间，小村寿太郎按照“强权就是公理”的帝国主义法则，蛮横无理地强迫清政府无条件地接受日本的要求。12月22日，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东三省事宜条约》。该条约是《朴茨茅斯和约》的继续和补充，它使日本实现了对朝鲜的独占，并把中国东北南部变成了势力范围。小村寿太郎使尽浑身解数为日本谋求了最大限度的权益。

四、小村寿太郎与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满铁”）是日本政府为了侵略中国东北而设立的殖民侵略机构，是执行日本国策的地方机关。

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根据《朴茨茅斯和约》，从俄国手中夺取了中国中东铁路南段（长春至大连）和经营抚顺煤矿等特权。为了经营南满铁路及沿线附属地，日本政府于1906年11月26日在东京召开了“满铁”成立大会。1907年3月5日，“满铁”总社由日本东京迁到中国大连，4月1日正式营业。

翻开日本政府的有关文件，我们可以看清“满铁”的性质：由政府设立；总裁、副总裁以及理事由政府任命；政府设满铁监督官以监督其业务；政府得以

发布监督会社（公司）事业的命令等等。此外，有关预决算、财会等都要经日本政府审查批准。由此可见，“满铁”的经营范围绝不仅仅只是一个铁路，它是在“代替政府经营南满洲”，并负有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情报等方面推行日本“帝国主义政策”的重要侵华任务，其职能除了经济掠夺外，还包括文化侵略、间谍活动等。

“满铁”的性质决定其在管理上受日本政府的直接监督。成立之初，“满铁”在中央受递信、大藏、外务三省大臣联合组成的监督官署监督，于是，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不仅为“满铁”的创建立下汉马功劳，还担任过“满铁”的直接上司。

为纪念对“满铁”建设有贡献者，“满铁”在成立 30 周年之际决定为小村寿太郎树碑立传。1938 年（昭和十三年），“满铁”联合关东军、关东局、日本驻伪满大使馆、伪满洲国等在大连“电气游园”为小村寿太郎树立了“功德碑”，时任总裁松冈洋右亲自撰写碑文。另外，“功德碑”前还立小村寿太郎铜坐像一尊。

“电气游园”由“满铁”建于 1909 年，占地面积 7 万平方米，是供日本人游玩的场所，园内因设电动木马而得名。1940 年，该公园改名为“小村公园”。

五、“小村寿太郎功德碑”的征集

1992 年 6 月 25 日，大连市园林管理处向大连市文物管理办公室反映一个情况，即日本东京银行驻大连办事处的两名工作人员到大连白云山庄公园游览时，在路旁发现一方石碑，他们提出想收藏，看如何处理。市文管办接到反映后，立刻会同旅顺日俄监狱旧址陈列馆的专家到现场考察，发现碑身呈长方形，正面碑文已被水泥罩面，只在左下角露出“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总裁松冈洋”字样。据此初步分析可能是“满铁”为第一任总裁后藤新平在星海公园（现星海公园）树的碑，解放后拆除移到这里。“满铁”作为日本殖民统治大连的侵略机构之一，这方碑石就是其侵华的铁证。

26 日，旅顺日俄监狱旧址陈列馆派车到大连白云山庄公园拉碑。据公园负责人介绍：此碑拉到公园是准备废物利用—刻筑路碑，但因碑面文字太多，加工费事便扔在那里。陈列馆将碑石拉回馆后除去碑面上的水泥，发现阴刻的碑文仍被水泥埋住，又雇了两名刻碑的石匠，用 10 天时间把碑文里的水泥清除掉。碑文终于彻底露出，真相大白，此碑是“满铁”为日本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立的功德碑。

1946 年 6 月 1 日，大连市政府将“小村公园”改名为“文化公园”，1966 年定名为大连动物园，1995 年该公园搬迁。“小村寿太郎功德碑”在解放后即被拆除，铜像现已下落不明。此碑经国家文物局专家组鉴定为 1 级文物。

参考文献：

- 《大连近百年史》
- 《侵华日军甲级战犯大结局》
- 《胆略外交》
- 《日本侵占旅大四十年史》
- 《苍桑岁月》
- 《城市建设志》

资料来源：大连文化网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對中國東北的移民侵略

孟月明

摘要: 移民侵略, 是日本对中国东北进行侵略扩张的重要手段之一。历时长达 40 年之久, 移民人数高达 30 余万, 在世界移民史上是罕见的。历经“试点移民”、“武装移民”和“国策移民”三个相互衔接的阶段。以农业移民为主, 同时包括政治移民、产业移民, 教育移民、技术移民、宗教移民等诸多类型。日本军国主义就是以军事占领为前提, 然后植入大量日本移民, 从而实现对东北的实质性殖民统治。日本移民既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参与者, 是中国人民的“加害者”, 又是日本军国主义扩张政策的“受害者”。

关键词: 九一八事变; 日本移民; 中国东北

日本移民名为“开拓团”, 实为移民侵略, 是近代日本推行“大陆政策”和对东北进行侵略扩张的重要手段之一。战争、移民, 都是日本军国主义扩张路线的产物, 移民是仅次于战争的重要侵略方式。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以后, 日本政府更加无所顾忌地进行大规模移民, 并把移民侵略列为日本政府的“七大国策”和伪满洲国政府的“三大国策”之一。日本政府之所以如此重视移民侵略政策, 是因为日本军国主义认定以枪炮夺取的土地, 还能以枪炮被夺回, 以锹镐开拓的土地, 要相对牢靠得多。由此可见, 移民侵略虽不及带血刺刀那般野蛮、残暴, 但却比武装侵略更具欺骗性和隐蔽性, 其目的更为阴险、毒辣。

一、日本对中国东北进行移民侵略始末

(一) 早期日本在中国东北的试点移民

日俄战争后, 日本便加紧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步伐, 移民政策作为一项重要侵略手段也被正式提了出来。1913 年, “满铁”从铁路沿线守备队退役兵中选拔有农业经验和热心农事的士兵进行移民试验, 即“除队兵”移民, 这是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分散移民之始。1915 年 3 月, 关东都督福岛安正在大连金州创建第一个移民试点村。因为移民者多来自日本山口县久珂郡的爱宕村和川下村, 因此入殖新村便命名为“爱川村”。[①] “爱川村”被日本殖民统治者视为向中国东北移民的“先驱”。1928 年 4 月, “满铁”以 1000 万元的资金设立了向“关东州”移民的专门组织机构“大连农事株式会社”。[②] “爱川村”移民、“除队兵”移民和“大连农事株式会社”移民, 是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的三次尝试, 但均以失败告终。但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移民侵略步伐并未就此停止, 反而以这三次移民失败的教训为借鉴, 制定并不断完善移民政策, 从而掀起了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两次移民高潮。

(二) 武装移民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 为日本殖民地移民论的积极倡导者们找到了施展“才能”的机会, 他们以九一八事变为契机, 极力促成日本政府向中国东北大量移民。东北沦陷后, 虽然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执行不抵抗政策, 但是东北民众和抗日武装从未停止过对日本入侵的抵抗。东北各地抗日力量的存在, 成为日本移民计划开展的障碍性因素。基于此, 日本殖民主义者更多重视移民对配合关东军“维持治安”的作用, 即镇压中国的抗日。所以, 日本把最初的移民计划定为“武装移民”。

1932 年 10 月 4 日, 第一次“武装移民”从东京出发, 14 日晚 6 时抵达佳木斯, 共 492 名移民团员。由于经常遭到中国抗日武装力量的袭击, 第二年 3 月

21日和4月1日,分两批入侵永丰镇,才完成第一次“武装移民”的入殖。1933年7月8日,由493名团员组成的第二次“武装移民”由东京出发,7月18日到达佳木斯,20日经永丰镇到达目的地依兰县七虎力河沿岸的二道沟地区。后来由于土龙山事件的爆发,日本移民团遭到沉重打击,搬出了七虎力屯地区,转移到以湖南营为中心的地区,组成“千振村”。1934年10月16日,第三次“武装移民”在警备指导员预备步兵中尉樋口孝一等人的率领下,由敦贺港乘“天草丸”号出发,18日到达清津,再乘特别列车经图们、拉法、哈尔滨,20日上午到达克音河站。最后侵入伪滨江省绥棱县北大沟,组建“绥棱开拓组合”,此次移民共259名团员。1936年2月至3月,第四次“武装移民”入殖,移入城子河的移民为310户,移入哈达河的移民为190户。

至1936年上半年,“武装移民”阶段已经结束,四次“武装移民”共约1800户。第五次移民处于从“武装移民”向大规模移民的过渡期,改称集团移民。1937年2月末至3月初,第五次移民团入殖。其中,入殖永安屯为298户,朝阳屯为278户,黑台为212户,信浓为212户[③]。此后,日本移民方针有了重大转变,开始了大规模移民侵略活动,进入“国策移民”阶段。

(三)“国策移民”

1936年8月25日,“二十年百万户移民计划”被确定为日本的“七大国策”之一,从1937年开始正式实施。为了掩饰其侵略本质,日本“要求”伪满洲国政府也将其列入“三大国策”之一[④]。日本殖民主义者把“百万户移民”视为其对中国东北侵略中最为得意、最为有效的政策,是全面对中国东北侵略的最基础力量,是建立“新大陆政策据点”[⑤]的重中之重。“二十年百万户移民计划”的国策化,标志着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侵略政策的最后确立和形成。

九一八事变当时东北有3000万人,日本计划用20年的时间向中国东北移民100万户、500万人,到1956年中国东北的人口将达到5000万,日本移民要占500万。“二十年百万户移民计划”如果实现,就意味着日本人布满了整个东三省,将近1/10的比例。这还是从静态的视角去计算的。5口之家意味着至少会有子女3人,而且入殖移民的男性户主要求年龄在“30岁以下,特殊者要求在35岁以下”。[⑥]根据这个年龄,他们的长子应该在10岁左右。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人口将以几何基数增长,去除死亡人数,20年后恐怕也千万人不止,将占东北人数的1/5或1/6左右,将根本改变伪满洲国的人口构成和民族分布,使东北殖民地化、日本人化,从而达到永久占据东北,最终达到领土延长的目的。日本移民中国东北其根本动机是十分鲜明的,其目的非常恶毒,就是要通过移民侵略来达到占我东北、灭我种族、亡我中华之目的。

日本拓务省在1937年5月,制定“二十年百万户送出计划”的第一期10万户送出计划(1937-1941年)实施大纲。从1937年开始实施,经过第六次至第十次移民,每年一次,1941年结束。“百万户移民”第一期五年计划原计划为10万户,尽管后来不断地修订、缩减为72000户,但由于战争和中日人民的反抗,终未能按计划完成。据统计,第一期移民实际入殖户数仅42635户,实际迁入率为58.7%。这是日本对中国东北移民侵略最猖獗的时期。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劳动力的大量兵员化和军需产业使用劳动力的急剧增加,劳动力的枯竭状况日趋激化,确保第二期五年计划所需要的“满洲移民”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日本殖民当局在第十一次移民完成“不振”的状况下,于1942年12月8日,又制定了“战时紧急开拓政策”。但事实上,因为日本经济的匮乏和对战争的自顾不暇,日本已经丝毫没有能力和精力来确保对中国东北移

民的实施。因此,1945 年度仅有移民 1056 户,“除向土地改良区和原有不景气的移民团补充迁入以外,一切按新规定的迁入均被停止。这样,日本帝国主义的满洲移民事业,在 1945 年 8 月以前已全面崩溃。”〔7〕

据日本战犯古海忠之笔供,到 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移入到中国东北的日本移民实际数共计 10.6 万户,31.8 万人,其中“青年义勇队”移民 10.8 万人。伪满时期用于掠夺和为日本移民开造农田的经费达 6.5 亿万元,用于移植日本移民及其他方面的经费达 5.9 亿万元,共计 12.4 亿万元。〔8〕

从第一次“武装移民”到 1945 年日本投降前,关于日本农业移民的数字,其差异甚大。除前面提出古海忠之笔供 318 000 人外,还有 321 873 人〔9〕、241 374 人〔10〕、270 428 人〔11〕、220 968 人〔12〕等几个数据。姑且不论这些数据的准确性,但无论是哪种数据都足以说明日本移民的规模之大,尤其是移民到外域,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

二、日本移民的类型

狭义概念上的日本“开拓团”,是指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农业移民。但准确地讲,日本移民应该是指除日本军人以外的一切不以武装占领方式入侵中国东北的日本人,日本军人家属也应属于移民范畴。所以,严格意义上的日本移民应包括农业移民、政治移民、产业移民、教育移民、技术移民、宗教移民等诸多类型。这些日本移民分布在中国东北各地,遍布各个领域,充斥在各个行业之中,是伪满社会的统治主体,给中国东北人民带来重重灾难。换言之,日本军国主义就是以武装军事占领为前提,然后植入大量日本移民,从而实现对中国东北的实质性殖民占领和统治。

(一) 农业移民

农业移民是整个日本移民计划的主体部分,也是日本移民中国东北过程中所占数额最大、组织性最强、最有计划化和规模性的移民类型。上面所提的“武装移民”和“国策移民”就是专门的农业移民计划。所谓农业移民,移民到中国东北的目的是进驻农村,从事农业生产。但是从来源看,除日本农民外,也包括城市失业者和贫困者。农业移民又分为武装移民、集团移民、集合移民、农业自由移民、铁路自警村以及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队。

1. 集团开拓团。集团开拓团即“百万户移民计划”中的甲种移民,是日本移民中的主要形式。它的前身就是武装移民。此时,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统治已达到相对的稳定阶段,为了适应更大规模移民侵略的需要,便把过去主要由退伍军人组成的武装移民扩展为既有退伍军人又有经过严格训练、挑选的日本人参加的集团移民,因而改换名称。这种类型的移民由政府直接组织,补助费较多,每一农户可以从官方支取旅费和直接津贴 1411.84 日元或 1570.00 日元,200 户或 300 户移民组成移民团或移民村。日本殖民主义者对这类移民要求很高,他们大部分被安置在所谓“开拓第一线地带”的中苏边境地区。这种集团开拓团前后共组织了十次,共有 185 个开拓团、男女合计 62635 人移入黑龙江地区的桦川、密山、虎林、林口等边境地区。

2. 集合开拓团。集合开拓团是《百万户移民计划》中的乙种移民。在移民侵略开始时称作“自由移民”,也叫一般性移民。这种移民有的是由民间组织的,政府给予的补助金略低于集团开拓民。政府对乙种移民主要是在车船费、土地购入等方面,大体上每户给予 300 元以下的补助,其余部分尽可能争取由民间资助。随着日本移民侵略规模的扩大,集合开拓民的应募条件也由过去超龄的退伍军人放宽到一般的百姓,其年龄由 30 岁左右延长到 40 岁左右。这种移民通常被安置

在集团移民的后面，就是所谓的“开拓第二线地带”。集合开拓民一般以 50 户至 100 户为一个移民团。1943 年以后，日本殖民主义者为了加强和扩大移民侵略，取消了这种类型的移民，将其全部并入集团移民中。

3. 分散开拓民和铁路自警村移民。分散开拓民即三、五十户为一单位的分散移民。由于日本国内的军事工业膨胀，民用工商业大量倒闭，结果有数以百万计的工商业者失业，于是日本殖民主义者便以“转业开拓民”的名义，建立了许多所谓的大陆归农开拓团。据《东北情报》民国二十六年 3 月 14 日报道，自日本拓务省之二十年的百万户农业移民计划成立后，全日本移民公私团体各就其职业科别，积极准备政、经、军诸般移民。分散开拓民中的许多人由于过去不曾务农，故移入中国东北后有些人专门经营烟草、乳酪、林业等地方特产，因而有些史料中也分别称其为“酪农移民”、“采金移民”与“林业移民”。“铁路自警村移民”在从事农业的同时兼负保护铁路的任务。据《第六次满洲发展报告》统计，1939 年全东北地区有铁路自警村二十三个，自警村移民 1285 人。

4. 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队。1937 年七七事变后，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的来源已经面临困境，因而关东军提出了“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队”这一方案，以弥补移民来源之不足，同时也作为后备兵源加以储备。从 1938 年开始，日本开始募集青少年移民，他们“进行大约 2 个月的内地训练，然后渡满分配到现地的各训练所内，再进行 3 年的现地训练，终了后成为独立的开拓民”[13]。至 1945 年 8 月，在东北的各种训练所共有 94 个。由日本内原训练所送到中国东北的训练人数为 86530 人（另有资料记载为 91903 人，到战争结束时尚在训练者仍有 22000 人），约占日本移民总数 30 万人的 30%[14]。由训练生组成的“开拓团”共有五批，计 279 个团[15]，共 10.8 万人。

（二）其他类型的日本移民

伪满期间，除了日本政府组织的大规模的集团、集合形式的农业移民侵略之外，还有其他形式各异的分散自由移民。这些移民也是经过日本拓务省批准，伪满洲国政府必须接受的日本移民。这种移民相对规模较小，人员可以自行组合，居住分散。他们分布在中国东北各地，充斥在各个行业之中。日本殖民主义者认为，分散自由移民更容易影响伪满全社会各族各业，容易产生民族融合的效应，实现以“大和民族”为核心的战略目的。因此，这些农业以外的其他类型日本移民对中国东北社会的影响和作用绝不可忽视。

1. 政治移民。众所周知，在伪满洲国存在的 14 年中，掌握伪满国家政权的，并非以溥仪为首的伪满官员，而是关东军司令官指挥下的各级日本官吏。这些日本官吏从伪满中央政府的总务厅到地方各级的次长制，乃至在县级以下实行的街村制中，形成了由上至下的殖民统治体系。而这些伪满洲国的日本官员就是伪满时期日本向中国东北进行政治移民的主体，成为伪满洲国整个统治中的“太上皇”，对中国东北人民进行直接的殖民统治。这些日本政治移民完全是通过关东军的所谓“内部指导”来实现政治统治的。到 1937 年，日系官吏已在伪满中央与省两级官吏中占半数以上，有些重要部门则是清一色的日本人，或日系官吏占有绝大比重。在县级政权机构中，日系官吏的比重也迅速增大。[16]

2. 宗教移民。在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过程中，日本国内的宗教势力也成为殖民侵略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哈尔滨的“天理村”移民团是最为典型的宗教性移民。此外，还有哈尔滨郊区的基督教教徒开拓团，奉天省净土真宗僧侣开拓团，黑河省、兴安东省的日莲宗信者开拓团等等，这些带有宗教性质的开拓团，名为“开拓”，实为对中国东北人民进行宗教教化，终极目标当然也是为所谓的“五族协

和”服务，同化中国人民，从而形成日本“大和民族”的统治核心地位，为日本军国主义殖民扩展侵略政策服务。与此同时，日本宗教的各个宗派纷纷派遣人员到中国东北各地传教，并陆续建立传教所和寺院。截至 1944 年，传教所的数目达到真宗大谷派 16 个、真宗本派 8 个、天理教 4 个、曹洞宗 2 个，总计 30 个。这些传教所全部附设在第一次移民到第九次移民的“集团开拓团”或“集合开拓团”中，成为移民宗教信仰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17]。

3. 产业移民。用日本的产业工人促进“满洲”的产业开发，“使其可能给日本原料，借以造成日满经济集团实际的原动力，促进满洲国的发展，且使其增进对日本生产品的购买力。” [18] 反过来又使中国东北成为日本产品的倾销市场。由此可见日本产业移民之险恶目的。1934 年，以奉天为中心的工业区开始建筑施工，吸引了大量的日本建筑工人。此后，日本内地的失业工人开始大量流入东北地区。进入移民高潮时期以后，“每年都有 20 万以上的制丝女工、纺织女工、造酒工人、渔夫、煤矿工人、工厂职工、学徒等失业人员和贫困的失业农民被大量介绍到中国东北。” [19] 到中国东北的日本产业移民，从事技术和管理类的较多。在鞍山昭和制钢所中，日本人的总数达到 11016 人，几乎垄断了所有管理和技术岗位。抚顺煤矿露天矿是被日本武装占领并由满铁直接经营的中国东北最大的煤矿。1944 年该矿约有 1-2 万日本人，从事管理和技术工作。

4. 技术移民。技术移民是日本侵占和掠夺中国东北各项资源的核心，日本在中国东北进行各种掠夺之前和过程中都是以技术移民的提前调查为前提条件的。为此，日本先后在我国东北建立了上百所殖民地科研机构，从事着为掠夺资源、为殖民统治、为战争服务的各类课题的研究。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特别是 1933 年伪满洲国成立以后，日本人为了“以科学研究开发、利用满洲国资源”、“于大东亚战争下展开科学战” [20]，在中国东北大量地建立科研机构。根据康德十年（1943 年）出版的《伪满洲科学技术要览》统计，截至 1942 年 8 月，日本在东北设立的科研机构有 93 所。专业齐全、遍布东北，研究人员总数有万人之众。这些科研机构中上万日本技术移民是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和全面侵华战争的重要工具。

5. 商业移民。商业移民与农业移民一样，是日本的满蒙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最初的所谓日本商业移民主要集中在满铁沿线的城市，但是影响很小。鉴于此，满铁产业部在 1937 年 2 月制定了《满蒙商业移民实施计划要纲》，利用过去向满蒙偏僻地区发展成绩显著的贸易馆机构，按 10 年计划积极向满蒙内地移殖移民 3000 人。《要纲》对商业移民的入殖方法、所需资金和预定入殖地都做了详细的规定。在日本统治经济主宰的局面下，中国东北的民族商贸业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和欺压，而日本商业移民则成为日本控制中国东北商业和进行商贸资源掠夺的帮凶和工具，极尽商业掠夺之手段，强占中国商业市场，进行进出口贸易经营和中国内地经营，帮助日本军国主义输送大量中国能源和粮食，最大限度榨取中国东北人民财产，严重影响和冲击城市人民生活。

6. 教育移民。日本向中国东北的教育移民，一种是专门从事教育管理和教育的，是日本对中国东北进行奴化教育的直接实施者。他们组织修改教学内容和教育体制，烧毁中国教材，对中国教师进行强化培训，使其成为推行日本殖民地教育的执行者。另一种就是高等教育当中的大学教师和学生。伪满的高等学校不是为中国人设立的，而是为日本人设立的，是以实现“日本人都入大学”为目的。按 1943 年《满洲帝国学事要览》载，在 6794 人中，中国学生 2716 人，日本学生 3717 人（占 54.8%），其他学生 351 人。日本殖民统治者的目的当然是

希望这些日本的青少年在大学毕业学成之后成为伪满洲国的中坚力量，让他们尽早适应中国东北的环境，为日本长期统治东北服务。

三、日本对中国东北移民侵略的影响和危害

(一) 日本对中国东北移民使中国东北殖民地化程度加重加深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迅速占领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中国东北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在没有进行移民侵略的情况下，日本对东北的占领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和军事行为，殖民地化程度还并未直接根植于中国东北农村的生产生活中。而随着大量日本移民的入殖和移民团的建立，则完全破坏了东北农村原有的村屯组织结构。日本移民入侵后，中国东北在多年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封建地主所有制的基础之上，又增加了一种新的土地所有制即“殖民地土地所有制”。日本移民团，在政治上是独立的基层政权组织，有着一套完整的日本化的乡村行政组织，成为日本在伪满洲国政治统治的末梢和基层的统治据点。在经济上是生产组织，依靠掠夺中国农民的土地收取租金、剥削东北农民劳动果实。在军事上，日本移民团是日本关东军的别动队，随时应召入伍参加侵华战争。同时在文化教育和民族统治上加重对东北人民的奴化和压迫。

(二) 日本对中国东北移民是中日战争持久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移民，尤其是农业移民使得其占据的东北农村成为日本侵华战争的后方基地和兵源基地。日本移民团作为日本对东北农村进行殖民统治的工具，既是战时的兵站据点和侵略堡垒，又是深入到农村的一种政治实体和武装力量，既起到了剥削和影响中国东北人民生产生活的作用，又有镇压和监视农民抗日活动的反动功能。日本移民帮助日本殖民主义者掠夺了中国东北大量的矿产、木材、黄金和粮食等物资。尤其是太平洋战争后期，在日本国内资源对战争的供给已经乏力的情况下，中国东北成为日本战时物质供应的主要基地。在战争的兵源供给上也是如此，日本男性移民在战争后期符合年龄的基本上全部应征入伍，成为日本维系战争的主要兵源基地，最后连同未成年的青少年义勇队都成为日本抵御苏联进攻的武装力量。尤其是日本移民团一般被安置在东北人民和东北抗日武装之间，以此隔断二者之间的鱼水联系。东北抗日联军成立以后，日本移民团的阻断作用日益加强，严重影响了以游击战为主的东北抗联的物质取得和后方保障。移民侵略是日本侵华的重要手段，移民对日本侵华战争的支援和辅助，是中国抗日战争持续 14 年之久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 日本对中国东北移民给中国东北人民带来深重灾难

日本侵略者为了实现庞大的移民计划，不择手段运用各种卑鄙方式从中国农民手中掠取土地，低价“收买”土地，名为收买，实为强占。为达到掠地安置的目的，日本移民对中国农民烧杀抢掠无所不为。至日本战败投降为止，共掠夺中国东北耕地达 3.9 亿亩，大量中国农民为此丧生、流离失所，灾难重重。失去土地被迫离开家园的中国农民有的被强迫送到矿山充当日本掠夺中国资源的廉价劳动力；有的被驱逐到更边远的地方垦荒，然后土地再被强占和掠夺；有的被迫沦为日本移民团的佃农和雇工，遭受日本移民的剥削和压迫。据 1943 年《满洲开拓年鉴》统计，日本各类开拓团雇佣中国劳动力年工 10470 人，月工 91798 人，日工 870785 人次。日本移民成为靠收取地租和榨取中国东北农民血汗的异国地主，他们对中国人民的盘剥和欺压更加肆无忌惮，民族和阶级的双重压迫，使东北农民生活更加屈辱、贫困。

(四) 日本对中国东北移民使日本移民最终面临悲惨命运

日本移民侵略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尤其是在日本战败投降后，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分子携眷逃离回国,将只剩下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的“开拓民”弃之不顾,“他们饥寒交迫,哭号于荒野,陷入了极其艰难的困境,有的因走投无路而自杀,也有的在途中因病而亡”[21]。据统计,到 1945 年日本投降时为止,共有 800 多个开拓团侵入中国东北。战争结束之际,日本开拓民 27 万人中死亡人数达 77500 人(其中战死、自杀的 11520 人),占日本人死亡人数 45%。[22]正是由于日本军国主义的移民侵略和最终的“弃民”政策,导致“日本残留妇人”和“日本遗孤”这两个特殊群体的出现。善良的中国人民以博大的胸怀收留和收养了他们,使得他们在异域的土地上得到重生。

结 语

时至今日,日本发动的九一八事变过去整整八十年了,和平的车轮已经碾过半个多世纪的历程,而日本军国主义对移民侵略仍是歌功颂德,大肆渲染日本“开拓团”对中国东北的“开发”、“建设”,“做出了许多贡献”,并为“这一落后地区带来了现代化”,成为“其乐融融”的“王道乐土”。日本军国主义歪曲历史,混淆是非,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容忍的。

最近我国又出现了黑龙江省方正县为“日本人公墓”内的日本“开拓团”死者立碑刻字一事,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应。方正县这一做法无论是出于人道主义目的还是以反省历史祈愿和平为出发点,都是不可取的,其结果是对日本侵华战争的纪念,和对被侵略的中国人民的民族情感的伤害。尤其是在九一八事变八十周年即将到来之际,这种做法极有可能助推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否认侵华罪行、美化侵略战争的论调。方正县为日本“开拓团”死者立碑刻名的背后,也充分反映出一个问题,即中国民众对日本侵华这段历史仍缺乏全面、客观和统一的认识,尤其是对日本侵华期间,日本“开拓团”的性质认识模糊,定位不准。

准确地讲,日本移民既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参与者,是中国人民的“加害者”,又是日本军国主义扩张政策的“受害者”。毫无疑问,日本军国主义是侵华战争的元凶,而日本移民则充当了侵华战争的助手、帮凶甚至是直接参与者。对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而言,他们就是侵略者和加害者,这种日本平民的战争责任是不可推卸的。与此同时,日本移民又是日本军国主义殖民侵略扩张政策的牺牲品和替罪羊。尤其是在日本战败投降时,“开拓团”被日本政府所抛弃,死伤无数,历经磨难。从这一角度而言,日本移民又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受害者。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日本“开拓团”并非受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之害,而是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之害,受日本战败投降后的“弃民”政策之害。

人是历史的最好见证者,日本“开拓团”则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无法磨灭的历史罪证。方正县“日本人公墓”里埋葬的 5000 多“开拓团”尸骨就是最好的见证;中国人民以博大胸怀收养收留的 5000 多名日本遗孤和大量日本残留妇人就是最好的见证;105 万余日侨俘从辽宁省葫芦岛港被陆续遣返回了日本也是最好的见证。他们的存在还不足以让日本国民警醒吗?千万不可再给日本军国主义以复活的土壤,也不要被军国主义的谎言所欺骗和利用了。

注释:

[①]拓务省官房文书课:《拓务要览》,1935 年,第 753-754 页。

[②]六嘉川细著:《植民史》,东洋经济新报社,1941 年,第 488 页。

[③]高乐才:《日本“满洲移民”研究》,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第 70 页。

[④]“满洲国”的“三大国策”为 1939 年 4 月 8 日发表,“三大国策”的内容:1. 北边振兴计划;2. 产业开发五年计划;3. “百万户移民”计划

- [⑤] 开拓总局总务处总务科编：《满洲开拓政策基本要纲》（开拓总局资料第 10 号），1942 年 5 月，第 9 页。
- [⑥] 日本拓务省官房文书课：《拓务要览》1935 年 10 月。
- [⑦] 满洲移民史研究会编：《日本帝国主义下的满洲移民》，龙溪书舍，1976 年 11 月，第 107 页。
- [⑧] 孔经纬著：《东北经济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第 531 页。
- [⑨] 关亚新、张志坤著：《日本遗孤调查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年 8 月，第 17—18 页。
- [⑩] 大藏省管理局编：《日本人海外活动历史的调查》（满洲篇）第 2 册，1939 年版，第 78 页。
- [11] 日本满蒙同胞援护会编撰：《满蒙终战史》1949 年版，第 345 页。
- [12] 《秘录——大东亚战史·满洲编》1946 年版。
- [13] 加藤俊次郎著：《兵农植民政策》，庆应书房，1941 年 11 月，第 194 页。
- [14] 满洲开拓史刊行会编：《满洲开拓史》，满洲开拓史刊行会，1966 年版，第 325-333 页。
- [15] 满洲开拓史刊行会编：《满洲开拓史》，满洲开拓史刊行会，1966 年版，第 302 页。
- [16] 李茂杰、孙继英：《苦难与斗争十四年》（中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 年 7 月，第 37-38 页。
- [17] 黑龙江省档案馆、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1989 年版（内部资料），第 336 页。
- [18] 满铁经济调查会：《满洲劳动统治方案》，立案调查书类第 30 编第 1 卷（续二），第 75 页。
- [19] 满铁经济调查会：《满洲劳动统治方案》，立案调查书类第 30 编第 1 卷（续二），第 126-129 页。
- [20] 王德：《科技侵略 铁证如山》，科技史志，1999 年第 1 期。
- [21] 政协黑龙江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等编：《梦碎满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285、187-195 页。
- [22] [日] 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编、东北沦陷十四年史吉林编写组译：《满洲国史》分论，第 322 页，吉林省内部资料。

资料来源：“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网

中東鐵路建設與回歸始末

佚名

中东铁路(китайская Восточная Железная Дорга), 初称"大清国东省铁路", 又称东清铁路, 1926 年后改称东省铁路。它以哈尔滨为中心, 东西连接绥芬河和满洲里, 南达旅顺大连, 呈丁字形, 是东北地区铁路交通主干线。

十九世纪下半叶, 沙皇俄国通过《璦琿条约》和《北京条约》, 攫取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广大土地。为了加强对新占领区的控制, 1886 年, 俄国政府议定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1891 年, 西伯利亚大铁路开工兴建, 到 1895 年, 铁路修到贝加尔湖地区。如何尽快将铁路修到海参崴, 俄国政府倾向于取道中国东北。这不仅因为这里地形平坦, 粮食和劳动力充足, 线路大大缩短; 更重要的是通过修铁路可以控制中国东北, 与日本争霸远东。俄国财政大臣维特认为, 这样将"使俄国能在任何时间内在最短的路上把自己的军事力量运到海参崴及集中于满洲、黄海海岸及离中国首都的近距离处", 从而"大大增加俄国不仅在中国并且在远东的威信和影响", 而且还有巨大的经济利益。这时, 正值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 被迫把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俄国遂联合法国、德国进行干涉, 迫使日本放弃辽东半岛, 由中国增加赔款 3 000 万两白银。不久, 俄国向清政府提出, 让西伯利亚大铁路通过中国东北, 共收"通商、调兵之利", 作为"还辽"的酬报。

1896 年 5 月, 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礼, 特邀清朝北洋大臣李鸿章赴俄。6 月 3 日, 李鸿章与俄方代表维特等签订了《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 即《中俄密约》。条约内容是中俄军事合作, 中国允许俄国在中国东北地区修建铁路, 具体事宜由华俄道胜银行承办。9 月 8 日, 清驻俄公使许景澄代表中国与华俄道胜银行签订了《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章程》。合同规定, 清政府以 500 万两白银入股华俄道胜银行, 由华俄道胜银行负责筑路全部款项; 铁路修成后, 俄方使用 80 年, 到期归还中国。

1897 年 3 月, 大清东省铁路公司正式成立。许景澄为董事会总办(即董事长), 俄国人盖尔贝茨为董事会会办(即副董事长)。8 月 28 日, 在中俄边境三岔口(今属东宁县)举行了中东铁路开工典礼。后来因为地形不理想, 铁路东端移至绥芬河。1898 年 7 月, 俄国强租旅顺大连, 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中俄续订东省铁路支线合同》, 允许俄国人修一条从中东铁路到旅顺大连的支线, 连接点最后确定在哈尔滨。

选择中心曾有过几个方案, 最终确定哈尔滨作为中东铁路的中心, 主要有以下原因: 首先, 哈尔滨位于满洲里和绥芬河的中间, 和旅顺大连可连成一条距离最短的直线; 其次, 哈尔滨位于松花江畔, 便于从水上运输筑路材料, 而且附近地势开阔, 有较大发展余地; 第三, 当时哈尔滨地区只有一些分散的、人口较少的村屯, 不仅距离黑龙江、吉林行政中心较远, 又避开了人口稠密的呼兰、阿城、双城等地, 便于俄国人移民和扩张势力。

1898 年 6 月 9 日, 中东铁路副总工程师依格纳齐乌斯率领工程局技术人员

乘轮船抵达道里江沿码头，在田家烧锅(现属东香坊)院内开始办公。6月28日，中东铁路工程局正式成立。中东铁路干线(满洲里至绥芬河)划分为13个工程区，南支线(哈尔滨至旅顺大连)划分为8个工程区。筑路所需钢轨和机械设备大部分由俄国运来，少部分从其他国家进口，砂石、枕木就地取材。筑路工程技术人员主要为俄国人，劳动力大量招募华工，据1900年6月统计，共有工人17万人。从1898年6月起，中东铁路东、西、南各段先后开始施工，哈尔滨地区从道里松花江边开始铺轨，经南岗到香坊，1899年3月4日通车到阿什河(今阿城)。哈尔滨第一个火车站设在道里江边，当时称“码头站”，南站名“松花江站”，香坊谓“老哈尔滨站”。哈尔滨站是1903年开始修建的，1904年末落成使用，取代了“松花江站”。哈尔滨松花江铁路大桥经过两年的准备，1900年5月4日正式动工，1901年9月19日竣工，10月2日交付使用。桥是石墩钢梁结构，钢梁呈梯形，全长1 015.15米，桥面铺设单轨铁道，设计时速50公里。

1900年，义和团反帝运动席卷中国北部，进入东北地区。6月，中东铁路建设工程暂停。7月，义和团和清军官兵联合围攻哈尔滨，俄国护路队拼死抵抗。爱国军民分兵3路向俄军进攻。东南方向主攻田家烧锅，占领并焚毁了这个中东铁路的中心机关；北面突破了江北船坞的俄军阵地；西面占领了元聚烧锅(现顾乡煤炭五商店址)，攻入“松花江”火车站，烧毁站内全部机车。8月2日，俄国援军乘船抵达哈尔滨，爱国军民被迫撤退。10月，俄国军队进占东北各地，东北义和团运动被镇压下去。在义和团运动中，中东铁路总办许景澄被清政府处死，使中国人担任的总办职位空缺17年之久，中东铁路完全被俄国人控制。正在建筑中的中东铁路也受到很大损失，事后统计约为7000万卢布。

义和团运动后，中东铁路恢复施工。1903年7月13日，中东铁路工程局总工程师尤格维奇宣布中东铁路正式建成，7月14日交付中东铁路管理局使用。中东铁路管理局坐落在南岗西大直街新建的大楼内，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霍尔瓦特，副局长依格纳齐乌斯。管理局下设办公室、工务处、运输处、医务处、学务处、矿业部、航运处、民政部、军事部等部门。从机构设置可以看出，中东铁路除主营铁路运输生产外，还取得了沿线矿产开发权、森林采伐权、内河航运权、教育权、民政管理权、驻军权等，成为名符其实的国中之国。

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侵略成果，极大地刺激了日本军国主义者。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俄国战败，根据《朴茨茅斯和约》，日本取得了旅顺大连租界地、长春以南的中东铁路和附属企事业。从此，南满洲铁道脱离了中东铁路，日本成立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加以经营。俄国保持了在北满的特权和利益。

中东铁路最早最大的企业是哈尔滨总工厂。它始建于1898年，位于道里松花江畔(哈尔滨铁路局材料总厂址)，当时称临时总工厂。设有机车、客车、货车和机械4个分厂，设备比较简陋，生产能力有限，满足不了铁路的需要。但它却是哈尔滨第一家大型机械工业企业，产生了哈尔滨第一批产业工人。1903年开始，在现哈尔滨车辆工厂址修建大厂，受日俄战争影响，到1907年才建成，正式定名东省铁路哈尔滨总工厂。总工厂下设11个分厂，安装各种机械设备280多台。年生产能力为大修机车90台、客车80辆、货车400辆。还建成了哈尔滨第一个发电厂。

中东铁路中央医院是黑龙江最早的西医医院之一。始建于 1900 年，位于哈尔滨火车站附近。当时医院设有 6 个临床科室，有病床 280 张。主要服务对象是中东铁路的俄国职员和中国高级职员。1928 年，新建一栋外科病房，增加病床 100 张。1935 年，被合并到哈尔滨满铁医院，成为其住院部。

1898 年中东铁路于哈尔滨市香坊开办了第一所小学。到 1926 年，中东铁路所辖俄人中小学 68 所，华人中小学 18 处。1926 年 9 月，教育权被东省特别区收回。中东铁路 1920 年 10 月创办的中俄工业学校，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前身，当年主要是为中东铁路培训工程技术人员。1922 年 4 月，该校改名为哈尔滨中俄工业大学，设铁路建筑系和机电工程系，学制 5 年。1928 年 2 月划归东省特别区管辖。同年 10 月，改名为哈尔滨工业大学，张学良曾任该校理事会主席。

俄国人借口修筑铁路，先后 3 次在铁路沿线扩占所谓的"附属地"。包括现在道里、南岗全部，香坊西部(以现在红旗大街为界)，道外西部(以景阳街、承德街为界，包括江北船坞)，由中东铁路直接管理使用。随着居民的增加，各国势力的侵入，迫使俄国改变统治方式。1906 年 12 月 29 日公布了《东省铁路附属地民政大纲》，提出组织居民"自治会"。1907 年 11 月 23 日通过了《哈尔滨自治公议会章程草案》，《草案》规定俄国人担任市公议会董事会主席，全部活动受中东铁路理事会和管理局局长监督。1908 年春推出公议会正式议员 40 名，成立董事会，董事 5 人，俄国人贝尔格任主席。董事分掌哈尔滨市政权力，任期 3 年。1909 年 5 月 10 日，中俄签订了《中东铁路界内公议会大纲》，中国政府承认了哈尔滨市自治公议会的权力。哈尔滨市自治范围包括道里、南岗各一部分区域。1926 年中国收回行政权力，成立"哈尔滨特别市"。哈尔滨市的中东铁路附属地其余部分，有马家沟、西香坊、正阳河、偏脸子、顾乡屯、八区、江北船坞等，统由中东铁路管理局民政部直辖。1921 年收归东省特别区市政管理局管理。

1906 年 10 月清政府批准设立滨江关道，管辖中东铁路附属地外的傅家甸、东香坊地区。1918 年设马家船口市政局，管辖哈尔滨道外江北松浦部分，1925 年更名为松浦市政筹备处。1933 年 7 月 1 日，伪满洲国政府将上述四合为一，成立哈尔滨特别市。

1917 年，沙皇俄国国内先后爆发了资产阶级"二月革命"和无产阶级"十月革命"，政权由沙皇转到临时政府，又迅速转到布尔什维克党手中。革命浪潮波及了以哈尔滨为中心的俄国管辖的中东铁路。东省铁路哈尔滨总工厂工人成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俄国护路队成立了士兵代表苏维埃，逮捕了反动的军官。6 月 22 日，哈尔滨工兵苏维埃成立，布尔什维克党员留金任主席。11 月 7 日，哈尔滨工兵苏维埃组成临时革命委员会，12 月 12 日，宣布接管哈尔滨政权，12 月 14 日，宣布撤销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霍尔瓦特职务，接管中东铁路。霍尔瓦特等白俄分子向中国当局求援。12 月 26 日，中国吉林省驻军奉命开入哈尔滨，解除了俄军的武装。12 月 28 日，留金领导的 4 000 余俄军被驱逐出中国国境，中国军队驻扎中东铁路沿线。12 月 29 日，吉林省长郭宗熙被任命为中东铁路督办，1918 年 2 月到任。

中东铁路管理局内以霍尔瓦特为首的反革命分子，残酷镇压革命员工。4 月 15 日，中东铁路哈尔滨地区的中俄工人召开秘密会议，通过了"采取一切措施，包括罢工在内，反对自卫军"的决议。5 月 15 日，为抗议自卫军枪杀俄国布尔什

维克党员横道河子教师乌曼斯基，中东铁路工人罢工一天，商人罢市，给铁路当局很大打击，损失达 30 万卢布。霍尔瓦特疯狂地镇压罢工，逮捕罢工领袖，开除罢工领导人，并在铁路沿线宣布戒严。

1918 年 5 月底，在帝国主义分子唆使下，捷克军团在西伯利亚发动反革命叛乱，扶植当地白俄分子建立反动政权。日本、美国、英国等协约国先后派出干涉军给予支持。哈尔滨成了武装干涉者和白俄分子活动的大舞台。捷克军团司令部设在中东铁路莫斯科商场（现黑龙江省博物馆址），自俄头目谢米诺夫、高尔察克都曾到哈尔滨活动，原俄国骑兵大将普列什阔夫被任命为中东铁路附属地俄军总司令，霍尔瓦特到乌苏里铁路四站（格罗捷格沃）成立了“全俄临时政府”，得到了日本承认。

为了筹措资金，中东铁路当局加强对工人的剥削，1918 年 8 月 28 日发布了减薪规则，引起广大工人的不满。9 月 2 日哈尔滨总工厂工人首先罢工，9 月 3-5 日，中东铁路各单位职工参加罢工，火车停运 10 天，铁路当局损失 150 万卢布。罢工虽被镇压下去，但铁路当局被迫宣布减薪规则暂缓执行。

1919 年初，美、日等国擅自议定由协约国共同监管西伯利亚铁路和中东铁路，中国被迫同意。3 月 14 日，协约国监管委员会在海参崴成立。3 月 15 日，监管西伯利亚铁路和中东铁路技术部在哈尔滨设立，著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任中国代表。

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哈尔滨人民的爱国斗争出现新的高潮，中东铁路工人从 5 月的经济罢工转到 7 月的政治大罢工。为了配合苏俄红军对高尔察克白卫军的斗争，7 月 18 日，哈尔滨总工厂工人首先罢工，21 日，发电厂工人加入，23 日，中东铁路全线工人罢工，铁路运输陷于瘫痪。罢工迫使铁路当局停发白俄钱币，工资改发洋票，又切断了高尔察克的运输线。8 月 19 日胜利复工。

霍尔瓦特于 1919 年 8 月返回中东铁路任职，继续网罗反革命分子，妄图组织武装，成立政府，并挪用铁路公款，拖欠职工工资，激起了中东铁路广大员工的反对。中国吉林督军鲍贵卿出面干预，1920 年 2 月改组了中东铁路理事会，俄国董事从 8 人减为 5 人，中国董事从 1 人增加为 4 人。撤销了护路军营务处，封存了所有的机枪大炮。3 月初，乌苏里地区布尔什维克党代表会见鲍贵卿，指出“霍氏为一旧官僚，不足以代表俄国”，由此引发了 3 月 13 日的驱霍大罢工。

1920 年 3 月 12 日，是俄国二月革命 3 周年纪念日，中东铁路工人开会庆祝并发表《宣言书》，历数霍尔瓦特罪行，向霍尔瓦特发出《哀的美敦书》，要求霍尔瓦特在 24 小时内交出权力。霍尔瓦特拒绝交出，3 月 13 日，中东铁路全线总同盟政治大罢工开始。中国地方当局借机宣布收回中东铁路一切权力。3 月 16 日，霍尔瓦特被迫宣布辞职，3 月 17 日罢工胜利结束。11 月，中东铁路选出新的理事会，宋小濂为督办，中俄各两人为会办。

列宁为首的苏维埃政权，经受了国内战争和反对外国武装干涉斗争的严重考验，政权逐步巩固，向中国人民伸出了友谊和援助之手。早在 1919 年 7 月 25 日，苏维埃政权还处在严重困难时期，就发表了《致中国国民及南北政府宣言》（即第一次对华宣言），声明放弃沙皇俄国从中国获得的庚子赔款和所有权益，对中东铁路及租让的一切矿产、森林、金产及其他产业，“一概无条件归还中国，毫不索偿”。宣言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爱国团体纷纷函电苏联表示感谢，

北洋军阀政府处理态度慎重，暂不表态。

1920年9月，北洋军阀政府派非正式代表张斯馨中将访问莫斯科，受到列宁的接见。9月27日，苏俄外长加拉罕发表宣言(即第二次对华宣言)，重申了第一次对华宣言的看法，但对中东铁路，改为“易订专约，规定劳农俄国使用中东铁路办法”。

1924年5月31日，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和苏联代表加拉罕在北京正式签署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和《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中东铁路从此结束了“国际共管”的历史，成为中苏共有的财产。“两缔约国政府声明，中东铁路纯系商业性质；并声明，除该路本身营业事务直辖于该路外，所有关系中国国家及地方主权之各项事务，如司法、民政、军务、警务、市政、税务、地亩、(除铁路自用土地外)等，概由中国官府办理。”同年10月，中东铁路公司成立新的理事会，根据《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中苏各派理事5人，中国鲍贵卿任督办(理事长)，苏方人员任会办(副理事长)。

1927年4月，蒋介石背叛革命，成立反共的南京政府。1928年12月，南京政府“统一”了中国。为了切断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联系，蓄意恶化中苏关系，1929年，蒋介石唆使东北当局挑起了中东铁路事件。7月10日，东北当局借口苏联职员宣传“赤化”，下令接收中东铁路，驱逐逮捕苏联职工，查封苏联驻东北各机关团体。7月18日，苏联宣布对华绝交，决定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8月，苏联建立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部设在伯力，加伦(布留赫)为司令官。张学良成立“防俄军”，兵力10万人。8月17日，南京政府发表对苏作战宣言。10月12日，中苏三江口之战，中国东北海军失利，苏军相继占领同江、富锦。11月，西路苏军进攻满洲里和扎赉诺尔，东北军伤亡惨重。11月24日，苏军进占海拉尔、密山等地，东北军败局已定。12月22日，中苏签订《伯力协定》，完全恢复7月10日前状态，双方撤兵。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东北和中东铁路全线。1933年5月2日，苏联政府外交人民委员季维诺夫向日本驻苏大使提出出售中东铁路问题，遭到中国政府反对。1934年10月，苏联以1.4亿日元将中东铁路卖于日本。1935年3月23日，中东铁路转让协定正式签署，中东铁路公司理事会宣布解散，日本“满铁”接收了中东铁路及其所属一切企事业。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14日，苏联政府与中国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等文件。《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主要内容有：1. 中东铁路与南满铁路合并成为一条铁路，统一名称为中国长春铁路(китайская Восточная Железная Дорога)，应归中苏共同所有，并共同经营；2. 铁路之共同所有权，应平均属于双方，任何一方不得以全部或一部转让；3. 中苏合办中国长春铁路公司，公司理事会由10人组成，中苏各派5人，中国人任理事长，苏联人任铁路局长；4. 在对日作战期间，苏联有权用该铁路运送军队和军需品；5. 协定有效期30年，期满后无偿转交给中国政府。

1945年9月22日，中国长春铁路公司理事会在长春成立，中国张嘉璈任理事长，苏联喀尔金中将就任副理事长。中国长春铁路管理局设在哈尔滨原中东铁路管理局旧址，苏联委派儒拉乌了夫少将任管理局局长，中国王竹亭任管理局副

局长。1946年4月18日，东北民主联军进驻长春，中国长春铁路公司理事会迁到沈阳办公。11月28日，苏联发表声明，决定撤走在沈阳的中长铁路公司苏联员工。

1946年4月28日，东北民主联军解放哈尔滨。7月25日，在哈尔滨成立东北铁路总局，陈云任总局局长，吕正操等任副局长，与中国长春铁路管理局联合办公。1948年11月，东北全境解放。1949年3月，中长铁路全线恢复通车。

1949年12月，毛泽东主席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经过长时间的谈判，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国长春铁路协定》等文件。在换文中声明：1945年8月14日中苏间所缔结的条约和协定均告失效。1950年4月25日，中国长春铁路公司理事会在哈尔滨成立，中苏双方各6人参加理事会，主席由中国余光生担任，副主席为苏联叶洛果夫。5月1日，新的中国长春铁路管理局开始工作，苏联格鲁尼切夫中将任管理局局长，中国刘居英为副局长。原东北铁路总局撤销，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驻东北特派员办事处，刘居英兼办事处主任。

1950年9月30日，格鲁尼切夫局长发布命令："中长铁路将非中长铁路所属财产移交予中国东北人民政府。"其中有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博物馆、沈阳市旅馆、大连工业大学、大连自然博物馆、大连中央图书馆等。

1952年9月16日，《中苏两国关于中国长春铁路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公告》发表，决定成立中苏联合委员会办理移交工作，移交工作于1952年12月31日前完成。10月20日，中苏联合委员会在哈尔滨成立，周恩来总理委派余光生、李明哲、陆曦、黄达、王学明为中方委员，余光生为主任委员；苏方委员有叶洛果夫等5人。下设有105个分委员会，进行具体工作。经过两个多月紧张而有次序的工作，完成了全部移交工作。1952年12月31日13时，在哈尔滨的中长铁路文化宫举行移交仪式庆祝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崇民、中华全国铁路工会委员会主席李颀伯等代表中国方面出席，苏联方面代表有苏联驻华大使阿·斯·潘友新、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恩·哥·巴雷绍夫等。中苏联合委员会全体委员和中长铁路员工代表也出席了大会。会上叶洛果夫、余光生、周恩来、滕代远先后发表重要讲话。滕代远代表中国政府向格鲁尼切夫局长授旗，表彰中长铁路的功绩。格鲁尼切夫发布命令，将中长铁路移交给哈尔滨铁路管理局管理。陆平局长宣读铁道部关于成立哈尔滨铁路管理局的命令。中东铁路——中长铁路结束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坎坷历史，开始了融入中国人民铁路的新时代。

来源：《哈尔滨市志 附录》

《滿鐵資料研究分會信息通報》摘登

滿鐵資料研究分會編

★滿鐵分會啟動第二屆先進集體和先進個人表彰工作

繼 2009 年對分會一期工作表現突出的單位和個人進行表彰後，分會秘書處建議對自 2008—2012 年 5 年間積極開展滿鐵及日偽文獻整理與研究並表現突出的成員單位和個人予以表彰。根據滿鐵分會 2013 年第一次會長會議決議，對表彰評選對象及範圍、表彰評選條件、評選方式等做如下要求：

（一）表彰評選對象及範圍：

滿鐵資料研究分會各成員單位及個人會員。

（二）表彰評選條件：

1、2008—2013 年 5 年期間積極推進滿鐵資料及日偽文獻整理工作，並取得顯著工作成果；

2、2008—2013 年 5 年期間積極開展滿鐵資料及日偽文獻的研究工作，並發表有關論著；

3、2008—2013 年 5 年期間積極參加分會年會及其他滿鐵資料研究等交流學習等活動。

（三）評選方式：

1、先進單位：以分會秘書處推薦，會長會審議的形式確定。

2、先進個人：單位自主申報與分會推薦相結合。各單位根據上述表彰評選條件推薦候選人 1 名，填寫《滿鐵資料研究分會先進個人評審表》反饋至分會，表現突出的單位可酌情增加推薦名額。

評先通知已於 6 月中旬發至各理事單位，請各單位結合申報條件積極組織申報，按通知要求及時反饋評審表格，秘書處將根據申報情況，認真評審，做好此次評先工作。

★2013 年審批分會基金項目立項手續的辦理工作順利進行

2013 年審批的分會基金項目共 8 家。6 月份，分會秘書處已為立項單位寄送紙版立項通知，為加強對基金項目的规范管理，秘書處特擬定《滿鐵資料研究分會基金項目任務書》，任務書中對分會基金項目的研究目標、研究內容、研究成果、工作進度、經費支付等內容進行了詳細約定，分會與各立項單位及項目負責人逐一簽訂此任務書，雙方共同遵照執行。簽屬此任務書後，立項單位即可準備開展相關課題的整理研究工作，分會也將按計劃、按比例撥付課題經費，並做好課題的後續管理等工作。

★滿鐵專家庫建設

滿鐵專家庫的建設是今年的一個新工作，由《滿鐵研究》主編許勇老師負責整理國內外知名滿鐵研究專家及其簡介，已初步形成滿鐵專家庫，目前正完善中，滿鐵專家庫的建設擬為分會的工作發展做好人才儲備。

★滿鐵分會第二屆理事會換屆前期準備工作已完成

滿鐵資料研究分會第二屆理事會成立於 2009 年 11 月，按理事會章程，每屆任期 4 年，本年度需完成理事會的換屆工作，秘書處已着手前期相關工作，擬定換屆工作通知、理事推薦表格等文字材料，按分會工作進度安排，秘書處將於近期發送換屆通知，分會的組織建設離不開會員單位的大力支持，分會對第二屆理事會成員支持與合作表示最誠摯的謝意。（鄭春妍供稿）

收稿日期：2013 年 7 月 17 日